

## 第二章

## 從文學到政治——王拓七〇年代的文學與思想析論

在本章的第一節，筆者擬先陳述台灣在七〇年代初期所遭逢的外交變局及內政困境，以期使讀者對於時代氛圍、知識份子思考、鄉土文學風潮的興起能夠有清楚扼要的掌握；在第二節中，筆者則分析王拓七〇年代的文學表現（包括《金水嬭》、《望君早歸》）及其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演變軌跡；在有了對於文學創作的分析作為基礎後，第三節裡筆者擬探討王拓七〇年代的行動實踐，並分析在這些動向背後，其思想來源及意識型態究竟為何。第四節的小結部分，筆者則嘗試對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的行動做出詮釋，並闡述《夏潮》內部對於實踐路線的異質思考。



## 第一節 新時代的胎動：七〇年代初期的台灣社會

### 一、危機與覺醒：七〇年代初期台灣的內外困境

我們是一群還在學校念書和甫離校門的知識青年，自覺受育於斯，受食於斯。對台灣這塊土地，我們有血肉相連的親切和感情，雖然未曾負擔過任何政治的行政責任，但是承繼了士以天下為己任之書生報國的傳統，因此，國事至今，我們自認為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和義務。

這是覺醒的時候了！<sup>1</sup>

國民黨政府於 1949 年底自大陸潰敗撤退來台，先前（8 月 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對華白皮書」裡嚴詞批評蔣介石，已宣布不再支持國民黨政權，但就在半年後的 1950 年 6 月爆發了韓戰，北韓大舉進攻南韓，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與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更形對峙之勢，而台灣以其在東亞的重要戰略地位，使得美國重新支持在台的國民黨政府，以對抗共產集團的擴張，於韓戰爆發後兩天下令第七艦隊巡航台海，並再度提供軍經援助給台灣。美國的重新支持使得因國共內戰失利、國際地位低落至谷底的國民黨政府，獲得了觸底反彈的契機，而台灣也因此被收編到美國與蘇聯相互對抗的全球冷戰結構之下。往後台灣二十年間的發展，正如呂正惠所言可用兩句話來概括：政治保守，經濟、文化西化。<sup>2</sup>

五〇年代中期，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已經站穩腳步，其以黨、政、軍結合的方式，在台灣厲行威權統治。威權體制之所以能夠建立起來，陳芳明認為「乃是由於它利用『代表中國』的名義來支配整個台灣社會。然而，『代表中國』的策略之所以成功，完全拜賜於美國政府的支撐——美國強力支持國民黨在聯合國據

<sup>1</sup> 見《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刊於《大學雜誌》46 期（1971 年 11 月），後收錄於王拓：《民眾的眼睛》（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8 月 15 日）。乃是一篇多人（王杏慶、王曉波、王拓、錢永祥等十五人）連署的文字。

<sup>2</sup> 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文學經典與文化認同》（台北市：九歌出版社，1995 年 4 月 10 日），頁 66。

有『代表中國』的席位」<sup>3</sup>，有了老大哥在國際上的撐腰及長期經濟援助，國民黨政府養成眾多事務皆需仰望美國的「親美」性格，而「美援」所代表的更是美式價值觀、意識型態大量滲透台灣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此外，五〇年代台灣出現的「反共文學」也可視為「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對峙情勢的連鎖反應，而六〇年代出現的「現代主義」風潮則是「反共文學」發展到了末流後，所出現台灣思想文化從屬美國的另一效應。

而在內部的政治經濟方面，五〇年代一系列的農地改革措施完成後，基本上日治時期最具有政經影響力的台灣地主階級已被拆解，國家成為最大的地主，得以隨心所欲榨取農業部門的利益，轉投至國家所需的方向，並有利於六〇年代推動「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製造台灣經濟的高度成長（所謂「經濟奇蹟」）。<sup>4</sup>除了經濟上官方事業的大量壟斷之外，國民黨又利用「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體制，「合法」限制、拒絕人民的參政權，獨攬1949年後二十年間台灣的政治大權。由於國共內戰失利的經驗，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為避免歷史重演，十分注意關於意識型態的各項事務，除大力清除所有左翼思想的「餘孽」、「餘毒」外，也藉由宣傳機構、教育體制大量灌輸人民「反共」、「中國正統」……等官方意識形態，而此間對於黨國威權的任何挑戰，往往都落得主事者被羅織入獄、從此噤聲的下場，五、六〇年代之交《自由中國》的「雷震案」及六〇年代《文星》雜誌的被禁，即是最好的證明。

不過，既然國民黨政府長期仰賴的是美國的經援與支持態度，一旦美蘇間冷戰結構起了變化，出現了「以和談代替對抗」的路線轉移後，靠「恐怖平衡」維繫生存的國民黨政權必然面臨危機。時序進入七〇年代，台灣於此時遭逢了一連串外交失利的事件：

1970年9月	日本對外發表釣魚台列嶼主權屬於日本，引發了由北美、歐洲以至於台灣島內大學校園一連串的「保衛釣魚台運動」。
---------	--

<sup>3</sup> 見陳芳明：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一個史觀的問題，《典範的追求》（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公司，1994年2月），頁225。

<sup>4</sup> 見楊照：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主義，《知識份子的炫麗黃昏》（台北市：大田出版公司，1998年11月30日），頁210。

1971年7月15日	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即將訪問中國大陸（早在7月初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已飛抵北京，進行第一次的訪問）。
1971年8月2日	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宣布將訪問中國大陸。
1971年9月16日	尼克森聲明贊成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及獲得安理會席次。
1971年10月26日	台灣宣布退出聯合國，自此中國大陸取代台灣在聯合國的一切權利。
1972年2月28日	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雙方簽署「上海公報」。
1972年5月15日	美國將釣魚台列嶼與琉球移交給日本。
1972年9月25日	日本與中國大陸建交，隨即台、日斷交。

這些外交危機事件大大衝擊了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對岸中共的崛起以及被聯合國獲得承認，使得國民黨政府長期灌輸民眾的「正統中國」神話——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世界的五強之一，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至此徹底粉碎、破滅。

此時除了外交局勢的日益窘迫外，經過國民黨政府二十年的政經壟斷，台灣內部也逐漸浮現出各種問題：在政治上，國會代表全面老化、省籍參政權益分配不均，導致爭議與批評聲浪不斷、而蔣經國這時也正面臨著接班問題；在經濟社會方面，六〇年代「以農業培養工業」政策雖造就了經濟高度成長，但伴隨而來的是傳統農村日漸破敗凋零、勞動人口大量流離遷徙於都市邊緣，引發種種社會議題、資本高度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貧富差距日漸擴大，工會組織卻不健全，底層勞工權益未受到保障、而在長期美援之下，依賴外資的情況也十分嚴重。

當時台灣社會的景況並不若政府長期以來宣傳的那般美好，強盛繁榮的表象在內外交逼下諷刺地被一一戳破。知識青年們普遍產生了危機意識，他們開始關心起國家大事，對政治社會議題發表意見，整體的言論活動日漸熱絡起來。

這批以大學生和年輕教授為主的知識青年（包括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王拓）多半出生於戰後，無論是日本殖民時期的經驗或八年抗戰的戰亂流離，乃由父祖輩的口中轉述才能得知（即使親身經歷也是童蒙時期），而白色恐怖事件在成長過程中雖偶有所聞，但在普遍噤聲與政府繁盛榮景的宣傳下，影響心靈有限。因此這批人在相對於父祖輩的穩定生活中成長，到了七〇年代初期，已是二十到三十

歲之間的青年了。許信良與張俊宏合著的《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提及：「只有家教嚴格的舊式大家庭才易於培養出服從權威的第二代，現代式的小家庭所培養的子弟是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的，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為純真無拘束的個性，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這是這代青年心靈上的基本特徵」<sup>5</sup>。也因為較無父祖輩的包袱及對於政治恐懼的陰影，因此面臨外交危機等「重大傷痛事件」(traumatic events)時，這批知識青年便能夠由消極的「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sup>6</sup>，他們意識到在社會快速變遷及內外危機的夾縫中，有股動能正在醞釀、有個新時代正在胎動著，因此言談中往往發出「覺醒」、「甦醒」等字眼的呼喊<sup>7</sup>，期盼青年們能夠奮起，共同面對國家的危難。他們認為台灣之所以遭逢外交困境，主要由於內政上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故主張要因應外交困境就必須先厚植國力，在內政上徹底進行革新。<sup>8</sup>而此時的《大學雜誌》便扮演著要求政治改革的核心角色。

當知識份子們不再「孤獨苦悶」、「消極蒼白」，而逐步將目光投注於台灣的現實社會時，便提高了對於社會大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生活）的普遍關心。許多學生青年開始組織「社會服務團」、「一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等走出校園、親身接觸大眾的活動，上山下海去認識農漁礦工人的生活實況，也揭露出在長期美好宣傳背後底層民眾生活的窘態。當一幕幕的現實浮出檯面，被社會大眾所認知，便逐步醞釀出一股「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風潮，也給了「鄉土文學」厚實的茁壯土壤。

<sup>5</sup> 見張景涵等著：《台灣社會力的分析》（台北市：環宇出版社，1971年10月），頁19。

<sup>6</sup> 關於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相關論述，可參考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2003年6月）。

<sup>7</sup> 例如上述的「這是**覺醒**的時候了！」；而《大學雜誌》第四十九期「台大社會服務團成立始末」一文的開頭，也寫著「保釣運動之後，台灣的青年朋友們**甦醒**了！」的字眼（粗體字為筆者所標示）。

<sup>8</sup> 見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析》，收錄於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年4月），頁105。

## 二、鄉土的「贖回」與批判現實的高漲：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風潮

「鄉土文學」之受到注目並非是七〇年代以後的事情，早在六〇年代中期就已經有黃春明、王禎和等以描寫鄉土小人物生活悲喜為主題的小說出現，並受到讀者相當地喜愛。「鄉土文學」作品之所以會在六〇年代中後期興起，筆者認為與台灣經濟的重心由農業轉向工業，導致農村逐漸凋零破敗有著極大的關係。<sup>9</sup>

邱貴芬在〈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此文中對於六〇年代中後期的「鄉土文學」作品，提及一個有趣的觀察角度：

當現代派作家以其不同的風格和途徑在摸索如何「翻譯西方」之時，「鄉土文學」領域裡另一種翻譯的動力也正在發酵：在地鄉土語言及文化，正轉化為陌生的文化他者，必須透過「翻譯」加以贖回。<sup>10</sup>

當人們多半生於斯、長於斯應該再熟悉不過的在地鄉土，竟然需要透過「翻譯」（而且「翻譯」的姿態千奇百怪）將其找回來時，不啻為一個可悲的現象。究其原因，除了社會整體的現代化過程中，鄉土文化及語言的流失乃是無可避免的現象之外，戰後國民黨所推行的中國認同再造工程，及透過各式文宣、文學作品所大量鋪陳出的遙遠「紙上鄉土」，也是造成在地記憶流失的重大因素之一。

不過，這個六〇年代中後期出現、企圖透過「翻譯」贖回鄉土的小說作品，與進入七〇年代後普遍所認知的「鄉土文學」，其面貌實有些不同。關於此點不少評論家皆有提及，如邱貴芬談及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便言：「敘述者對於

<sup>9</sup> 台灣產業結構的第一級(農林水產畜牧業)在總產業所佔的百分比，從1960年的32.8到1965年的27.3到1970年的17.9，十年間約下降了15個百分點，而第二級產業(工礦、建設、水電瓦斯)則由1960年的24.9到1965年的28.6到1970年的34.7，十年間約上升了10個百分點。第一級產業及第二級產業的彼消我漲，大約在六〇年代中期出現了關鍵交叉點，而台灣經濟在這段期間呈現了急速工業化的情形。以上資料見劉進慶著、陳艷紅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經濟》(台北市：故鄉出版公司，1988年6月25日)，頁58-59。

<sup>10</sup>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台灣小說史論》(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2007年3月15日)，頁198。

萬發竟落到以妻換取一生盼望的牛車，這樣的庶民生存困境，並未顯露太大的悲憫，或是想要藉此為庶民代言，批判社會結構的不公不義」<sup>11</sup>；而銀正雄批評王拓的〈墳地理哪來的鐘聲〉一文中也提及：

猶記得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鑼」、「癩」、「蘋果的滋味」以及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發表時，那時「鄉土文學」作品所表現的精神確實是拙樸而純真，給當時的文壇注入一股清新健康的氣質。然而，民國六十年後，「鄉土文學」卻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sup>12</sup>

銀正雄的立場在此暫時不論。由上文我們可以明顯觀察出，進入七〇年代後由於社會中「回歸現實」、「回歸鄉土」的意識高漲，過去那種以淡淡筆調描寫淳樸鄉土小人物悲喜生活的作品，似乎也逐漸朝向更積極、更具批判力道的方向前去。

進入七〇年代以後，鄉土的「贖回」持續進行著，在眾多人士及雜誌刊物的努力下，台灣過去的歷史記憶被挖掘出來／重新發現<sup>13</sup>；而文學上則開始出現揭露社會黑暗面、批判各種不合理現狀、傳達底層民眾憤怒的作品。在這當中，取材八斗子漁民生活的王拓及描寫工廠工人的楊青矗，稱得上七〇年代「鄉土文學」的典型代表，同時這也是何欣將他們的作品稱之為「使命文學」的原因。<sup>14</sup>

<sup>11</sup> 同上註邱貴芬該文，頁 236。

<sup>12</sup> 見銀正雄：〈墳地理哪來的鐘聲〉，原發表於《仙人掌》第二期（1977年4月1日），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年4月），頁 199—200。

<sup>13</sup> 例如李南衡對於日治時期文學史料的蒐羅、張良澤對於鍾理和作品的提倡、黃煌雄的蔣渭水研究、楊逵的重新被發現、《夏潮》一連串關於日治時代人物、文化運動的介紹等；另外七〇年代的民俗風大盛，洪通的素人畫、朱銘的雕刻、陳達的月琴走唱此時也席捲台灣文藝圈。

<sup>14</sup> 見何欣：〈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論楊青矗和王拓〉，《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頁 147—175。



## 第二節 從八斗子漁村到台北大都會：王拓七〇年代小說析論

### 一、漁村的悲歌與「出走」的兩難：《金水孀》析論

#### （一）從「前 現實主義」到「描寫的現實主義」

比起許多作家在大學時期即創作、投稿（如《現代文學》的作家群），王拓整體的文學起步是較晚的，1970年7月王拓退伍後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讀，9月短篇小說作品〈吊人樹〉（後收錄於《金水孀》）發表於《純文學》42期，才算是正式步入文壇。在分析探討王拓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金水孀》之前，筆者認為有幾點是必須先加以釐清的：

或許由於對王拓的研究尚不充足，因此在大眾普遍的印象中，其小說內容所刻劃的即是漁村漁民的困苦生活，而寫作風格就是相當現（寫）實主義。其實這是過於籠統、概括的說法，既無法涵蓋王拓作品完整的主題意識，也無法展現其寫作風格的演變軌跡。筆者在考察王拓七〇年代的小說後發現，其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實並不是那樣「寫實」的，而寫作風格似乎也經歷過幾個轉折。

對於個人文學創作的起步，王拓如此表示：

（師大畢業後）我在花蓮中學教書的時候，讀了很多別人的小說，像王禎和啦、黃春明啦、陳映真啦、白先勇啦這些人的小說，然後對文學開始非常有興趣，然後就從舊書攤買來一套《文學雜誌》，《文學雜誌》就是那個夏濟安編的，然後也買了很多什麼《現代文學》啦、《文學季刊》啦這些雜誌來讀，然後就開始對文學有興趣，開始對小說有興趣，所以我起步很晚。<sup>15</sup>

既然王拓文學興趣的啓蒙有大量來自於六〇年代的「現代主義」作品，為何其日後的創作及所主張的文學理念，會與「現代派」大異其趣呢？對此，王拓表示這或許跟他的「性格」有關吧。

<sup>15</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7。

筆者以為王拓此處所言之「性格」，多半是指童年在漁村的貧困生活，以及艱辛的成長歷程所帶給他人格養成，以致於日後其作品關注的焦點，多半在於社會的現實面及底層民眾生活；此外，筆者認為王拓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讀，幫著尉天驄編輯「文季」系列刊物的經驗，亦是影響日後寫作風格轉變的因素之一。林瑞明在談論《筆匯》的文章中便言及：

雖說《筆匯》時代多少已透露出對現實的關懷與批判，但仍不免沾染濃厚的「現代主義」傾向，這股「創作取材於現實社會」的伏流到了《文學季刊》時便漸漸浮至檯面。尉天驄曾表示《文學季刊》雖仍以學院派風格起始，不過因能從現實社會找材料，所以不致受困，進而有所捨棄，日後發展成《文季》季刊終究是必然趨勢。<sup>16</sup>

王拓七〇年代文學風格的轉趨「現實」，與「文季」系列刊物的演變有莫大的關係。在訪談中，王拓認為自己早期的作品（如：〈吊人樹〉）「基本上也不是非常的寫實……那很講究所謂學院派的意象啦、象徵啦、氣氛營造等等」，日後他才開始強調「寫實主義」<sup>17</sup>。那究竟王拓是從何時轉向批判社會的寫實主義寫作風格呢？經過考察、比對，筆者認為1973年應是一個轉折的年份。

在此，筆者先將王拓七〇年代所發表的小說作品，分列如下：

發表日期	作品	發表刊物
1970年9月	吊人樹	《純文學》42期
1971年6月	墳地鐘聲	《純文學》54期
7月	海葬	《臺灣文藝》32期
8月	蜘蛛網	《純文學》56期
1972年未有文學作品發表		

<sup>16</sup> 見林瑞明：《筆匯》的創刊、變革及其影響，發表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研討會論文集》（2003年11月29-30日）。

<sup>17</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8。

1973年 2月	祭壇	《現代文學》49期
11月	炸	《文季》2期
1974年 5月	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	《中外文學》24期
1975年 8月	金水孀	《幼獅文藝》260期
以上篇章皆收錄於《金水孀》		
1976年未有文學作品發表		
1977年 4月	春牛圖	《中國時報》副刊
5月	車站	《中國時報》副刊
6月	望君早歸	《中國時報》副刊
7月	獎金 2000 元	《中外文學》24期
8月	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	《現代文學》復刊號
以上篇章皆收錄於《望君早歸》		

從第一篇作品〈吊人樹〉(1970年9月)到〈蜘蛛網〉(1971年8月)為止，筆者認為這是王拓創作的「前·現實主義」時期；1972年王拓並未發表文學作品；而在1973年2月所發表刻劃教育界／學術圈逢迎拍馬、勾心鬥角的作品〈祭壇〉，則代表著王拓的寫作始進入「描寫的現實主義」時期。<sup>18</sup>

筆者之所以稱王拓早期的四篇作品(〈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蜘蛛網〉)為「前·現實主義」作品，而非「現代主義」作品，事實上乃是由於這四篇小說的「過渡」色彩濃厚，其內容所刻劃的議題皆是相當寫實的(上吊自殺、教育界的腐敗、下一代的出走問題、升學的失落……等等)，但是其寫作風格、技巧卻是相當講求學院派／現代派的氣氛營造、意象、象徵，甚至於意識流手法：例如在〈吊人樹〉中，作者便透過鑼鼓聲的形容用字「輕郎！狂！」、「痛！痛痛！」、「痛愴！」等，暗示著故事情節及悲慘結尾，而用枝極的黑影投射彷彿幽冥鬼手伸向賴家，企圖營造出陰暗詭異的氛圍；而在〈墳地鐘聲〉中則運用越聚越多的烏鴉象徵「不吉利、陰暗腐朽」的到來，此外或許也有「天下烏鴉一般黑」

<sup>18</sup> 1977年以後的作品(收錄於《望君早歸》)內容風格又有所轉變，筆者稱之為「批判的現實主義時期」，此部分待下節再行論述。

的諷刺寓意；而在〈蜘蛛網〉中則運用蜘蛛及蜘蛛網的意象，象徵著主人翁被不幸命運緊緊纏繞束縛、掙脫不得的悲慘景況；在〈海葬〉中王拓則運用了大量「內心獨白」的寫作方式，展現賴水旺意識中的輾轉反覆。此外，除了個別篇章的寫作技法外，如將此四篇作品與之後所謂「描寫的現實主義」小說稍作比較，也可以發現王拓在早期作品的開頭處往往花上不少筆墨去描繪天氣、景色，企圖營造出一種在理應歡樂的氣氛之下浮動著哀傷、蒼茫無助，有時甚至是淒清詭譎的氛圍，這與之後的作品往往以描寫實景、人物吆喝對話的方式迅速切入故事主題，有著顯著的差異；而筆者之所以稱 1973 年到 1975 年的作品為「描寫的現實主義」，乃是由於此時期王拓的寫作無論是技法或是內容上，固然都相當「現實」，但是在這些作品中他並不介入個人的批判或價值判斷，敘事的視角基本上是從一個「知識份子」的位置上出發，保持一定距離「描寫」記憶中的八斗子漁村，故以此稱之。<sup>19</sup>

除了文學作品之外，如果從王拓的評論文字來作思索，我們也可以發現到類似的演變軌跡。王拓在《張愛玲與宋江》一書的序言中如此提到：

我在文學批評方面的學院訓練不夠堅實，所以，我的評論文字都難失之主觀，尤其是最早期的文字，更是充滿了濃厚的唯心主義的傾向與知識份子的浪漫色彩，而完全忽略了作家與小說人物所處的時代的客觀環境與社會條件。但是，在較後來的文章中，我總算比較合理地考慮了這些對作家與

<sup>19</sup> 「realism」一詞在中國大陸學界——尤其是美術界討論畫家米勒與杜米埃兩者的差異時——存在著「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嚴格區分，蔣勳曾言：「其實現實主義也是受到大陸的影響，就是說他又要跟寫實主義分開，寫實主義是一種技巧，要把活生生的東西畫得很像，現實主義是說你要有一種主觀的關心在裡面——現實主義有多一點的批判性。」（見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的「訪蔣勳」部分，頁 108）。王拓七〇年代的作品也有著從「寫實」到「現實」的轉變過程，但由於在台灣「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二詞經常混合使用，而王拓的相關自述中，多半也認為除了早期的作品外，自己的寫作是「現實主義」。故於本論文中筆者較為寬鬆地將「寫實主義」與「現實主義」視為同義詞，並在其前面加上「描寫的」與「批判的」兩個修飾詞，以表示其內容精神上的差異。另外，關於王拓七〇年代寫作的分期，山田敬三曾以 1975 年為分界線（事實上就是分為《金水孀》及《望君早歸》兩個部分），稱前半期為「（日本的）自然主義」時期，而後半期為「寫實主義」時期。相關論述可見山田敬三著、涂翠花譯：《作家王拓——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拓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 3 月）。

小說人物有重大影響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現實。<sup>20</sup>

這本集子所收錄的是王拓 1971 年～1974 年左右的評論文字(大多是文學評論)，其中早期評論張愛玲的文章，確實可以看出他較為直觀、唯心、注重符合人性，以及「以含蓄為貴，多利用暗示、聯想與啓發的作用」<sup>21</sup>的品評觀念。而其思想態度的轉變，從 1973 年 8 月所發表的〈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這篇文章中可嗅出一些端倪。在這篇文章裡頭，王拓對於現代主義作家開始有了一些批判，他認為作家應該考慮文化環境與社會現實，而歐陽子援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加諸在小說人物身上，並不符合台灣當時的社會背景；此外，王拓也批判很多作家在成名後脫離一般民眾，活在個人的象牙塔中、生活經驗過分狹窄、對社會現實及文化環境也缺乏敏銳的感受與洞察……等等。<sup>22</sup>由以上我們可以發覺此時的王拓已開始注意起文學的現實層面及社會價值，逐漸轉向日後現實主義傾向的思想與創作風格。

那為何 1973 年是王拓轉趨「現實」的主要年份呢？筆者認為外在社會潮流更朝向「回歸鄉土、回歸現實」應是重要因素之一：隨著大學生們上山下海認識農漁礦工人生活實況的風潮，王拓在 1973 年也回到故鄉八斗子去，對漁民們做了一次深入的訪談，使他對於漁村困境有了更確實的瞭解<sup>23</sup>，因而日後能夠創作出〈炸〉、〈金水嬌〉等刻劃漁民生活斑斑血淚的作品；再者《文季》在 1973 年的創刊，現實主義的旗幟更加鮮明，直指「作家必須走入社會，剷除自私，關心別人，而且要不斷地在現實中學習……」，而唐文標掀起現代詩論戰的文章之一〈詩的沒落〉也發表在《文季》上，對於現代主義的批判炮火日益猛烈<sup>24</sup>，王拓

<sup>20</sup> 見王拓：《張愛玲與宋江》(台中市：藍燈文化公司，1977 年 3 月)，頁 2。

<sup>21</sup> 見談張愛玲的「半生緣」一文，原刊於《青溪》(1971 年 1 月)，後收錄於《張愛玲與宋江》。

<sup>22</sup> 王拓：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原刊於《文季》(1973 年 8 月)，後收錄於《張愛玲與宋江》。

<sup>23</sup> 見王拓：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八斗子訪問實錄，原刊於《大學雜誌》第 69 期(1973 年 3 月)，後收錄於《民眾的眼睛》(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8 月 15 日)。

<sup>24</sup> 見林瑞明：《筆匯》的創刊、變革及其影響，發表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戰後初期台灣文學與思潮研討會論文集》(2003 年 11 月 29—30 日)。

身處其中，必然受到不少的影響；此外，筆者認為王拓這時個人內在的思想吸收也有所轉變，由於「台大哲學系事件」後陳鼓應被「流放」到政大國關中心之故<sup>25</sup>，此階段的王拓開始陸續從陳鼓應那邊獲得一些左翼思想、政治經濟學的相關書籍，使得王拓的「土左」有了系統化、理論化的機會：

我很記得從鼓應那裡拿到一些書，譬如說《政治經濟學》，那時候台灣哪裡有「政治經濟學」？沒有呀。連這個名字也沒有聽過，然後「馬克思主義」都沒有。那時確從鼓應那裡影印了這些東西，那我印象最深的我認為呢，讀這些東西是給予你一個了解世界，了解這個社會一個非常好的工具，你讀這些書以後你對社會的理解，會有一套方法。<sup>26</sup>

日後王拓的評論逐漸能夠觀照到作家及其時代的歷史條件與「物質基礎」，甚至到了評論楊青矗的《工廠人》及批判當代知識份子的迷惘與徬徨時，其文字當中更是出現了不少馬克思主義式「唯物史觀」、「剩餘價值」等等分析方式。<sup>27</sup>

## （二）「困守」抑或「出走」？

《金水孀》是王拓的第一本小說集，內容收錄八個短篇，依創作時間排列分別是：〈吊人樹〉、〈墳地鐘聲〉、〈海葬〉、〈蜘蛛網〉、〈祭壇〉、〈炸〉、〈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金水孀〉。<sup>28</sup>其中除了〈祭壇〉的場景及書寫主題是在教育界／學術界之外，其餘篇章多刻寫八斗子漁民的生活面貌。作家的初寫作往往由自身最熟悉的題材出發，王拓也不例外，他之所以選擇漁村作為小說的主要場景，當然

<sup>25</sup> 「台大哲學系事件」係指 1972 年 12 月到 1975 年 6 月之間，由國民黨特工系統對台大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進行的一連串整肅行動，事件後有八名教師受到「不續聘」處分。其相關始末可見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台北：花孩兒出版社，1979 年）、台灣大學：《台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1995 年）。

<sup>26</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1。

<sup>27</sup> 見王拓：《當代小說所反映的台灣工人：談楊青矗的「工廠人」、從當代小說看知識份子的迷惘與徬徨》，皆收錄於《街巷鼓聲》（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6 年 3 月）。

<sup>28</sup> 《金水孀》在 1976 年由香草山書屋出版，《望君早歸》在 1977 年由遠景出版社出版，而 2001 年九歌出版社將此二部小說重新增訂出版。經筆者比對，重新出版二書除了小部分字詞的刪改增補外，主要內容、情節、對話並未有太多更動。以下（包括《望君早歸》）的引文、頁數皆根據七 0 年代所出版的版本，特此說明。

跟他從小生活在八斗子的經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外，七〇年代初期知識青年上山下海從事農村、漁村與礦工問題的調查，揭露許多經濟成長表象背後勞工、漁民們生活艱難的現實，也是促使王拓回首故鄉而將其寫進小說的原因。<sup>29</sup>綜觀《金水孀》這部小說，其內容主題幾乎都圍繞在「漁村的悲歌與出走的兩難」此議題上，故在下文中筆者擬由這條脈絡切入，探討王拓在《金水孀》當中所刻劃的七〇年代漁村景象，以及其所欲傳達的內容意識。

在王拓最初的兩篇作品裡頭，筆者認為他似乎有意描寫整體漁村的破敗、漁民的落後愚昧：在〈吊人樹〉裡，作者透過鑼鼓喧天的媽祖祭典、精采的舞獅，帶出一個關於情愛與婚姻的悲劇。故事中的賴海生在祭典中擎舉著沉重的獅頭、淌下斗大的汗珠不斷舞動，期盼透過賣力的表演獲得媽祖聖母的垂憐，救救他的太太阿蘭。阿蘭自從在廣場上見到那位賣膏藥、打拳頭的外鄉人之後，就開始心神不定，後來那位外鄉人在他家門前的大樹上吊自殺，被阿蘭在半夜裡瞧見了，更使得她的神志迷糊不清，病態更加嚴重……。王拓在小說中花了不少段落描寫賴海生舞著獅頭時心中的喃喃祝禱：「聖明的媽祖啊！請看我為你舞弄的獅頭呀，你要庇祐啊！庇祐我的女人好起來。我是虔誠的討海人，你的子民呀……」（頁20）。不過事與願違，在故事的結尾處阿蘭也同樣上吊於家門前的那棵樹上。

其實，在情節的推演過程中，讀者很輕易地能夠知曉故事中的那位外鄉人，即是阿蘭未出嫁前在台北幫傭時所認識的情人，後來兩人被迫分離，外鄉人走遍各地想找尋阿蘭及他的小孩（當時阿蘭已懷孕）的下落，而終於在八斗子見到了朝思暮想的昔日情人。但此時的阿蘭已經嫁給海生，一切都無法挽回了。王拓在這篇小說中似乎有意諷刺討海人普遍的無知、迷信，一旦遭遇問題便將其歸因於鬼神、沖煞，無法對症下藥，終於導致了無可挽回的悲劇。小說中刻意塑造了幾位令人同情的角色，如賴海生及他的父親阿旺伯，他們確實相當虔誠努力，期待媽祖的救贖，但結局卻是依然挽回不了的悲劇。王拓在此對討海人既批判又同情，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大概可以歸咎到（貧窮所造成的）民智低落吧。

<sup>29</sup> 可參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年5月），頁8-9；及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83學年度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鄭梓）的「訪問王拓」部分。

或許由於這是作家的處女作，所以〈吊人樹〉的敘事手法並不是很高明。當外鄉人在廣場上講述自身故事，以及見到阿蘭時的失態表現時（當然還包括阿蘭一見到外鄉人轉身就跑的舉動），讀者對於一切實情便立刻了然於胸了，這使得故事的懸念無法延續，也無法有效達到小說結尾處的落差諷刺效果。而且，如此的敘事手法甚至容易使讀者心下泛起疑問：「作者是否太低估討海人日常生活的智慧了？事態既已如此明顯，怎麼可能沒有一個人聯想得到。」由於敘事手法上的缺陷，使得作者批判討海人凡事皆訴諸鬼神迷信的力道，也大大減弱了。

〈墳地鐘聲〉的故事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是杜滿福帶著遭受體罰的兒子到校理論，與老師引發口角爭執。他的兒子之所以被體罰，乃是由於遲交補習費的緣故；而故事後半部則是描述學童賴靖順上廁所，卻慘遭校舍倒塌被壓死之事。學校的校長一再保證不是工程上的毛病，而漁民們也認為這是由於鬼怪作祟的緣故，只有校工老潘堅持是學校地基出了問題。

筆者認為〈墳地鐘聲〉這篇小說的特殊之處，即是其通篇內容並未有十分具體的情節推演，作者的筆法比較像是在勾勒一張日漸腐爛破敗的校園圖畫。在這幅「異色」的圖裡，讀者可以瞧見：老師的惡性補習、因遲交補習費體罰學生、誣賴學生偷東西；同事間的爭吵齟齬；學生出意外，校長將一切推給鬼神，對於工程建設毫不負責；校長與女傭私通、老師勾搭女人……等各種教育界的黑暗面。此外，作者同時也刻劃了漁民普遍的迷信及愚昧，不認為校舍的倒塌乃是建設過程中人謀不臧的緣故。在這其中，學校的校工老潘代表著一片混濁中相對清醒的人，他不斷地清除垃圾、打掃廁所（因為這個學校「越來越髒」了），在半夜裡則是敲打著所謂的「暮鼓晨鐘」欲點醒人們。——但是，敲得醒嗎？

王拓在這篇小說中清楚揭露了教育界的各種黑暗面，但是這種「揭露」行動卻引來了銀正雄的不滿與批評。銀正雄認為王拓寫作〈墳地鐘聲〉是「惡意的攻擊」、「根本就無意建設」、「以暗示、烘托的手法來醜化他們的行為」，鄉土文學到了此時「有逐漸變質的傾向……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sup>30</sup>而王拓則在〈鄉土文學與現實主義〉一文中回應表示，這篇小說中還是

<sup>30</sup> 見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原發表於《仙人掌》第二期（1977年4月1日），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年4月）。



有正面人物老潘及討海人，他們「對於下一代充滿了愛心與關心」，而且「任何一個社會都有許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事實存在，台灣自然也不例外」，因此「現實主義文學之反映這些事實」不能說是惡意揭發社會黑暗面。<sup>31</sup>

〈吊人樹〉及〈墳地鐘聲〉兩篇作品描繪了漁村及地方學校的日漸破敗、腐朽，面對這樣的無奈命運，漁村居民及其下一代該如何面對未來？王拓在他的第三篇小說〈海葬〉中開始探觸到「出走」的問題。

如同王拓早期的作品一樣，〈海葬〉的開頭也營造了一種無奈、悵然的氛圍。賴水旺面對漁村平時最易見的娛樂：「賭博」和「上茶室」，今日無論如何是提不起勁了，原因是兒子學校的老師今日突然來家庭訪問，希望他能讓小孩繼續升學，這使得賴水旺感到十分為難。「少年人實在需要出去多看看世面」（頁 57），但是他又擔心一旦孩子讀太多書，出去以後就不想再回漁村來，更遑論要求他出海去捕魚了！這也使得水旺再度想起自己年輕時也曾有機會離開漁村到外面去，但因為父親的責罵及自身的怯懦，後來便困守漁村再也無法脫身了。通篇小說約有四分之三的篇幅，皆是描寫賴水旺個人的「內心獨白」，作者運用一層一層的轉折，來表現水旺思緒的反反覆覆與舉棋不定。

王拓在小說中深刻描寫了討海人面對「出走」難題時，那種對於命運、未來的不確定感，以及思緒當中綿延不斷的焦慮徬徨。上一代用孝順、養兒防老、外頭不會比較好的理由困住這一代，這一代又想用相同的理由去困住下一代，討海人的世世代代似乎都得困守漁村、葬於海上，水旺對此感到無限寂寥；但是「出走」就一定保證會更好嗎？一身捕魚的本領去到了外頭，還能從事什麼工作？也就是因為如此多的不確定因素，往往消滅了「出走」的念頭與勇氣。到了小說結尾處，水旺似乎也沒有任何具體的結論，終究還是浪潮聲伴隨著思緒的輾轉反覆，不斷侵擾著他。

在〈海葬〉中的賴水旺對於是否要讓孩子「出走」顯得十分猶豫、徬徨，但是在〈炸〉當中的陳水盛卻是一心一意想讓孩子上學讀書，讓他日後不必在「貧困的漁村混一輩子」（頁 131）。不過陳水盛所遇到的難題卻是沉重的經濟壓力——

<sup>31</sup> 這是一篇訪談稿，原發表於《夏潮》第 17 期（1977 年 8 月 1 日），後收錄於上註尉天驄該書。

孩子明天就要註冊了，他卻湊不齊足夠的錢——因此，他將賣地瓜賺來的一百多塊錢拿去賭博，希望藉此大賺一筆以解決問題，結果沒想到最後卻把錢全輸光了。回到家中面對妻子的逼問，水盛悻悻然地大步跨出家門，之後他去找雜貨店的興旺嫂借錢，卻被要求拿自己的兒子來抵押。最後在氣憤及走投無路之下，只好鋌而走險學人家非法炸魚，導致最後炸出了嚴重意外。

在這篇小說當中，作者明白地刻劃出漁民生活的困苦艱難、血淚斑斑，即使主觀意願想脫離漁村「出走」，但客觀的現實經濟條件也往往無法配合。像陳水盛這樣的一個老實漁民，因為經濟壓力不得不鋌而走險，從事平常連想都不敢想的炸魚，最後反倒炸傷了自己，實是一場徹底的人間慘劇。

不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這篇小說中鋪寫了一位本是嗜錢如命的雜貨店女主人興旺嫂，在水盛被火藥炸傷後，還不顧其死活一心只想逼問他如何將欠債還清。由於擔憂水盛還不出錢來，她便前往水盛家中打算搬東西抵債，結果出現在她眼前的卻是一片家徒四壁的景象，水盛的小孩在發燒中喃喃叫喊著「媽媽」，這使她不禁深自檢討反省：「我怎麼會用這種手段對付這一家人呢？我怎麼會變成這樣沒有心肝的人呢？……」（頁 164）。雖說如此的轉折多少有些突兀、牽強，但王拓在此還是讓讀者看見到了在他欲揭露的社會黑暗面中、在凡事只講求金錢利潤的時代裡，人性光輝總還是會有偷偷「溢出」的那一面。

王拓在上述幾篇小說中刻劃了漁村的貧困艱苦及「出走」的難題，彷彿暗示著如果不想辦法脫離漁村，一生就將困守於此，然後葬於海上。那該尋何種管道脫離貧窮漁村呢？受「教育」可能是一種方式。在〈蜘蛛網〉當中王拓大量運用象徵的手法，描繪主角易冬林的命運如同被蜘蛛網緊緊纏繞一般，自從母親過世以後，他就失去了上大學深造的機會，整天倒臥在小閣樓裡，在夢囈與現實中不停地穿梭徘徊，顯得既蒼白又無助。故事的結尾，易冬林終於憤而向阿婆要求母親的遺產並爭取升學的機會，結果在爭執過程中失手掐死了阿婆。

王拓自己是循著「升學」管道脫離漁村的，因此寫起「出走」、「升學」這類的題材可謂駕輕就熟。但如果詳加考察這些作品後當可發現，事實上作者幾乎是不現身於小說當中，也很少涉入個人價值評斷，他就只是「一五一十地描寫上下

兩代人站在人生的叉路上僵持不下的情境而已」。<sup>32</sup>也就是說，如果讀者欲從這些小說中探究王拓對於「出走」的態度——到底應不應該讓下一代受教育？還是應該讓他們繼續留在漁村裡？——其實是容易找到解答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如果王拓對於「出走」抱持的是肯定論的話，那麼他在另外三篇作品〈祭壇〉、〈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金水孀〉當中所傳達的，似乎又並不是那麼地樂觀。

〈祭壇〉是《金水孀》裡場景及刻劃議題比較特殊的一篇作品，內容描寫一位就讀中文研究所的「高級」知識份子董德耀（懂得要？），經由人家介紹在中學任教，但一心一意想獲得母校系主任的賞識，拔擢他回母校任教，因此不停地對系主任逢迎拍馬，在同儕間則實施合縱連橫、處心積慮散佈謠言，希望能拉人下馬，使自己得利。

這篇小說將所謂「高級知識份子」那種俗不可耐的嘴臉，刻寫得淋漓盡致，諷刺力道十足。王拓自己也就讀過研究所，因此對於學術圈鉤心鬥角的醜陋面可謂知之甚悉。在小說中他穿插運用了「中學」與「研究所」兩個場景，藉由在中學調查學生被毆打的事件，由學生口中道出這位董德耀的「差別待遇」——只喜歡成績好的學生，並且聽從成績好的學生打小報告。但董德耀自己則顯得理直氣壯：「什麼？你說我偏心？莫名其妙，他是第一名，我當然說他好。」（頁 111）、「你應該學習謙虛，他的功課比你。」（頁 112）、「什麼大報告小報告？……敢批評我？太放肆了！要是沒有侯立隨時來報告，全班不都要造反了？」（頁 117）。董德耀如此的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因為他自己離開為人師表的中學，到了研究所裡也是同樣以打小報告向系主任輸誠的。在學術圈裡是如此處心積慮的鬥爭，這些人到中學去又將錯誤觀念傳達給下一代，當然台灣的整體教育是會出問題的，「上樑不正下樑歪」大概是王拓想在這篇小說中傳達出的諷刺意味吧。循著「教育升學」這條管道「出走」，到達了研究所如此高的學術層級，呈現出來的卻是這樣一幕幕為了個人利益而扭曲人性的現實景況，不得不使讀者對於「出走」議題多了份反向的思考。

而在〈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王拓則描寫了一個年輕的醫生義雄，由於

<sup>32</sup> 山田敬三語，見 作家王拓 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拓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年3月），頁 260。

求學過程中村人的期待及小學老師的諄諄教誨，使得他在台大醫科畢業後辭謝了私人大醫院豐厚的薪酬，也放棄了美國大學提供的優厚留學獎金，效法史懷哲深入非洲的精神，滿懷熱情與愛心返回沒有醫生、既是礦區又是漁村的貧窮落後故鄉服務。初時他滿懷熱忱，但是現實環境卻令他逐漸失望、低落消沉：「他們又要馬跑，又不給馬食草。我只多收了他們一些醫藥費，他們就擺出一張張苦哈哈的臉孔給我看……我的醫院也要設備，也要花錢，我不是開救濟院。」(頁 184) 而談及他最佩服的史懷哲醫生時，他說：「史懷哲，史懷哲有整個歐洲的道德理想支持他，有錢的人捐錢給他，沒錢的人在精神上鼓勵他。而我們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頁 185) 比起他的同班同學都在台北開起了大醫院，困窮的義雄逐漸感到失落了，他懷念起大學時代的生活與都市的美景：「田園、野人、天琴廳，午後的咖啡館的情調多麼愉快」(頁 183)、「在愉快的音樂旋律中喝咖啡、談理想、談抱負」(頁 183)。只是當初所談論的那些理想與抱負，到了今日卻反而深深苦惱著返回家鄉奉獻的義雄，使他無法自拔。

在故鄉的土地上成長、茁壯，然後藉由升學脫離貧困的故鄉，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是否終將成爲一個「異鄉人」？留在都市中，成就的是私人小我的利益，故鄉依然徘徊在窮困破敗的邊緣；但是返回故鄉奉獻卻又必須忍受物質、精神上的雙重失落，年輕時的理想與浪漫遭遇到殘酷現實便一一幻滅了。王拓在這篇〈一個年輕的鄉下醫生〉中爲我們展現了七〇年代知識份子面臨「出走」抉擇時的兩難困境。

而在小說集當中最後一篇的〈金水孀〉，則是銘刻了不少王拓成長過程中的辛酸血淚，可說是以其成長經驗爲背景，加上小說手法所織就出來的篇章。金水孀是八斗子漁村裡挑雜貨擔子兜售日常用品的婦人，她的家道原本極爲艱苦，而丈夫又是一個沒有責任、好吃懶做的人，但是她卻有辦法含辛茹苦地栽培六個兒子都讀書唸大學，因此一提起金水孀，八斗子的人無不打從心底稱讚，而且也認爲她快要苦盡甘來享清福了。但不幸的事情發生，由於兒子聽信了一位牧師的話，因此金水孀跟丈夫四處借錢、掏出老本給兒子合股做生意，最後卻受騙上當。此時在會錢、債務逼得緊的情況下，金水孀只好硬著頭皮去跟兒子們伸手要錢，結果這些受教育「出人頭地」的兒子們卻紛紛找理由推託，棄雙親於不顧。此時

金水孀的丈夫又突然病發身亡，在她心力交瘁之時，兒子們卻爲了喪葬費用如何分配爭執不休，且待了沒幾天就紛紛離去了。這一幕幕殘酷的現實景況令人感到寒心，也難怪金水孀的丈夫在死前會大嘆：「唉！兒子六七個，都只是好聽的，還輸給人家沒子沒孫的人」、「時代很不同，社會已經完全變樣了。養兒子？唉！白了的！」（頁 210）。

王拓在小說中明白刻劃了受教育出走的那一代，在商業社會下逐漸變形、扭曲的現實嘴臉，他花了不少筆墨刻寫住在都市裡的兒子媳婦們的價值觀，例如：金水孀從家鄉帶乾魚脯給兒子，媳婦卻認爲這種東西菜市場很多，要吃他們自個兒會去買（頁 215）；踏進兒子家中的客廳時，媳婦關心的是「電視上的花瓶是日本帶回來的，不要打破了！」（頁 216）；她跑到兒子上班的合作金庫去，兒子見到她卻是一陣不滿與嫌棄：「妳要來也要穿得體面一點，穿得這樣黑墨墨破落落的，給人看到叫我要把面皮放到那裏去？」（頁 226）。在故鄉受教育而「出走」的人，竟也開始嫌棄起故鄉的破舊落後，甚至連撫養自己長大的母親也都瞧不起。面對這種情況，金水孀想起小時候兒子依偎在身邊，訴說著日後要賺大錢給她花的景象，兩相對照之下，她是如何也想不透兒子們怎會變成如此……。

在關於〈金水孀〉的眾多評論文字中，陳映真（署名「許南村」）的〈試評「金水孀」〉可說是最著名的一篇，而董保中的〈「金水孀」與「金水孀」批評〉<sup>33</sup>一文則對於陳映真的評論有著不同的意見。筆者擬藉由兩篇認知不同的文字，嘗試探索〈金水孀〉的內容意義。

對於金水孀的「雜貨擔子」是否代表著「商業資本主義」徹底滲透了台灣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基本上筆者較爲同意董保中的意見：

我覺得雜貨擔本身實在不能「說明」工商業商品是怎樣「執拗而稠密地滲透到」一個「偏遠」的漁村裡，因為雜貨擔是一個道地的農業社會做小買賣的一種方式，在中國恐有幾千年的歷史。

<sup>33</sup> 董保中：「金水孀」與「金水孀」批評，發表於《聯合報》（1977年10月4日）第12版。

在六、七〇年代的台灣漁村裡，陳映真理想中所謂「單純的物物交換、自給自足的前·近代的經濟生活」早已不存在許久了，因此如果單憑金水孀這個經濟規模相當小的雜貨擔子，以及裡頭有毛巾、肥皂、牙膏、香水和三角褲等現代性商品，便要說漁村民眾的生活「早已嚴密地組織到商品所飢餓地尋求的市場裡」，實在有些牽強；再者，如果陳映真的分析能夠成立，那貧窮的金水孀實際上便是一個在漁村裡頭藉由雜貨擔子獲取利潤的「剝削」階級了，但是這個「剝削」階級自己卻在小說後頭反被商業資本主義所害，並且也無法理解兒子們價值觀的轉變，此亦是不通之處。但是，筆者同時也無法同意董保中對〈金水孀〉整體情節的詮釋，他認為：

「金水孀」故事情節發展的基本衝突是進步 (Progress) 與落後 (Backwardness) 的對立，是現代化與保守的不調和，是動力的 (Dynamism) 跟滯留靜止的摩擦。我以為這是「金水孀」這個短篇小說的時代的特殊意義。而金水孀不幸的是落後、保守與靜止的代表，也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悲劇」的犧牲者。

基本上董保中如此說法，與日治時期日本殖民者的「殖民進步主義」思考並沒有什麼兩樣<sup>34</sup>，他將所謂的「進步」與「落後」擺放在線性史觀的發展上，因此在台灣在經濟成長過程中，「落後」與「滯留靜止」被犧牲掉似乎是理所當然且必要的，怪只能怪金水孀自己不幸，因為她是「落後、保守與靜止的代表」。

其實陳映真與董保中所代表的即是台灣七〇年代左右翼路線的不同詮釋，而如此的爭辯在「鄉土文學論戰」中關於台灣經濟是否為「附屬經濟」時，尤其有著更白熱化的討論。在〈金水孀〉中，筆者認為王拓實際上所要描寫被商業資本主義所「異化」的並不是金水孀，而是她的這群兒子們，當他們接受教育而由漁村「出走」後，思想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為工商業社會的運作邏輯給扭曲、異化了，忘卻了漁村中所保有的傳統倫理價值，因而將雙親捨棄，甚至連債務都推給父母

<sup>34</sup> 關於「殖民進步主義」的相關內涵，可見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研究所 89 學年度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呂興昌）。

親。筆者認為這才是〈金水孀〉這篇作品所欲傳達的旨意。

而在如此陰暗殘酷的現實裡頭，小說結尾處卻出現了光明的一面。即便金水孀遭到兒子們無情的對待，甚至必須遠走台北替人幫傭來還清債務，但是她卻依然去廟裡替她的兒子們祭煞補運，並且表示「等還完（債）了，她就要重新回到八斗子，清清白白的，她要到媽祖廟來燒香謝神」（頁 256）。王拓在此刻劃了一個偉大豐厚的母性形象，對比起週遭激變的人性現實面，金水孀誠懇且寬厚知足的傾訴，對於未來充滿了樂觀希望的態度，實在令人動容。

綜觀《金水孀》這本短篇小說集，筆者認為它始終圍繞著「漁村的悲歌與出走的兩難」此議題。王拓先是刻劃了漁村的破敗、落後，以及滯留漁村的悲慘景況，似乎暗示著「升學」是脫離貧困從漁村出走的良好途徑。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卻又描寫了高級知識份子俗不可耐的臉嘴、返鄉貢獻卻遭逢物質精神雙重低落的現實窘境，以及受了教育出走的人們竟捨棄了故鄉的父母親。究竟王拓對於「出走」議題的思考是什麼？關於此，筆者曾於訪談中詢問過王拓，他如此表示：

我過去寫的這方面的小說，是寫身邊我真熟識的題材啦 他們可能無真深的對生命的體會、理解，抑或是說思考，他們可能無，不過我看到以後感覺這是人生命中會遇到的問題，所以說人要不要受教育，去改變他的現狀？當然要啊。所以我們一世人感謝我老母呀 啊你要叫我老母講出一套大道理，她也無，她就感覺說不要乎她的囡仔甲他的老爸一樣，一世人「青暝牛」嘛。「青暝牛」你聽有嗎？眼睛看無【看不到】的牛嘛！那個處境是很悲慘的嘛，她不要乎她的後生【兒子】繼續這樣，啊她有看到的是讀冊可以乎她的囡仔改變，所以她甘願她過得艱苦，她也要（讓她的小孩讀書）。這是我老母的觀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走這條路，我們兄弟攏走這條路。但是那當陣台灣的社會是不是干那這條路爾爾【而已】？嘛無是。有真多黑手嘛成功呀，就是說有真多黑手嘛改變他們的環境啊

在台灣整個社會變遷的過程裡底，有一個階段真多黑手仔成功，脫離他們過去那種真貧困的環境，然後變成很成功的企業家第一代，當然他們後來也透過自己的努力，來自我教育，讓他們自己提升。所以我想這個人的

基本的一個動力吧，就是對於自己身處在一個非常貧困的環境裡面呢，就自然有一種動力想要去衝破，有的人衝不破，就回到原來的那個環境裡面去，有的人衝破了，靠自己，有的人衝破了，除了靠自己以外還靠別人，比如說靠父母、靠兄弟等等，我認為這是人生命中碰到困境的時候，一定會有的反應。所以有的很感動，有的即使失敗了，也很感動人，那個動力本身就令你很感動了啦。一個作家要寫的不是只有自己的經驗而已，還看到別人的，但是有一個前提，一定讓這個作家感動的他才能夠寫得好。<sup>35</sup>

就上述回答看來，王拓基本上是肯定人們應該要憑著自身努力去脫離貧困的，只是脫離的方式未必非循著「受教育」這條管道不可，有不少人也透過另外的方式去突破人生的困境。

此外，由上述的回答我們亦可發現，王拓在《金水孀》的寫作中其實只是將他身邊那些熟識的人事物——無論是衝破了困境、或是失敗的——給描繪出來而已。事實上仔細考察這些小說，讀者多半僅能從場景、題材的選擇中，隱隱窺知作者的立場與位置，王拓本身很少直接涉入小說情節明白展現其價值判斷的，這與日後「鄉土文學論戰」時，不少人士攻擊他的小說「批判太過」、「表達仇恨、憎惡」<sup>36</sup>，似乎尚有著一段落差。筆者認為在《金水孀》這部小說中，王拓依然保持著「知識份子」的立場，有距離地刻寫著漁村漁民。關於此，山田敬三曾認為：

王拓是出身漁村的知識份子 能夠向這個難題挑戰，膽敢逃離漁村的人，在他逃出的那一刻，他已成了故鄉的異類 像他這樣的勞心者，是萬萬不可能再回去做個討海人的。儘管他心中對故鄉有無限依戀，漁民們卻只把他當做一個異鄉人而已。於是，知識份子王拓開始單戀他的故鄉。<sup>37</sup>

<sup>35</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3—14。

<sup>36</sup> 如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年4月）

<sup>37</sup> 見山田敬三著、涂翠花譯：作家王拓——當代台灣文學管見，收錄於高天生編：《王拓集》（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年3月），頁 256。



筆者不清楚山田敬三是從何處去判定漁民們「只把王拓當做一個異鄉人而已」。但是他所提出的「知識份子」位置的說法，確實是相當犀利精準。邱貴芬在〈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中指出：

在台灣新文學裡，「底層人民」的角色相當微妙。除了是被壓迫的廣大大眾，有時也以一種「民間智慧」的姿態出現，與殖民教育體制下知識份子的觀點形成一種張力。戰後的鄉土文學則較凸顯底層人民如何遭受欺壓。庶民的形象也變成需要透過知識份子（如敘述者）的仲介方能發聲的被壓迫者。<sup>38</sup>

這樣的觀察套用到《金水孀》確實也是如此。小說裡所呈現的漁民形象，大多是愚昧、落後、無知的，他們自身並未展現太多反抗命運的主體能動性；而王拓在小說的對話中摻入不少「台語方言」，其目的只是為了達到模擬現實的「傳神」效果，他自己也認為「如果太過強調（台語方言的使用），便很容易使人陷入一種偏狹的、分裂的地方主義的觀念和感情裏」<sup>39</sup>，而他在小說的主要敘事則是使用流利、純熟的中文，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也表示著當時社會底層民眾的聲音，乃必須透過知識份子的「仲介」與「翻譯」，才得以傳達給主流的社會聽見。

<sup>38</sup>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1960～1980 現代派與鄉土文學的辯證〉，《台灣小說史論》（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北市：麥田出版公司，2007年3月15日），頁248。

<sup>39</sup> 見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8年4月），頁116。

## 二、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困境：《望君早歸》析論

### （一）從「描寫的現實主義」到「批判的現實主義」

王拓 1973 年自政大中文研究所畢業後，留在政大中文系擔任講師。他自陳「我原本追求的是穩定安靜的人生，最希望當個學者、作家、教師，能終生與書為伍，以寫作為志業」<sup>40</sup>，但由於其小說反映了底層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的悲苦與掙扎，且評論文字〈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也明白地揭露漁民所遭逢到的各種困境，因此相當程度地惹惱了政府當局。隔年七月，王拓在不明原因下，未獲政大聘書，只好轉任光武工專講師。

在光武工專時，正逢蔣介石過世（1975 年 4 月 5 日），政府通令全國人民舉哀，光武工專全校師生均佩帶黑臂章，而王拓因為對蔣介石一生功過頗有質疑，故拒戴黑臂章，結果此舉引起光武工專主任教官的注意，開始指派學生在課堂上紀錄其講話內容。而其中某生由於在報告上認為「王老師的課程學生都反應良好，也未有對蔣總統的不敬」，結果被反誣「那你思想有問題，你受王老師的影響太大」，該生悲憤之下將實情偷偷告予王拓，令他感到十分震撼：

我知道這項事情以後，我是震撼！shock！教育怎麼（變成）這樣？我雖然知道我在政大講授「中國小說選讀」的時候，已經有人打我的小報告，隱隱約約知道，再加上一點猜測嘛。不過沒有一個學生這麼明白地告訴你說「是主任教官要我紀錄你講的話」。我感覺說教育怎麼變成這個樣子？這就干那親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所謂「資料彙編」、「史料彙編」，看到那種老爸告自己的兒子、兒子去告老爸，密告！妻子去密告丈夫、丈夫去密告妻子的情形一樣。我感覺，幹！這個社會哪會變成這個型【樣子】呢？人跟人之間最起碼的溫暖、信任，整個瓦解！這還成一個社會嗎？<sup>41</sup>

<sup>40</sup> 見王拓：《我的人生 我的夢》一文，為《金水孀》、《望君早歸》新版自序。

<sup>41</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7—18。

在極度驚駭及對於教育被嚴密控制的失望下，王拓決定離開教育界。離開光武工專不久，王拓在《台灣政論》創刊號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小事情所反映的大問題——八斗子所見、所聞、所思〉，內容報導蔣經國訪問八斗子漁村後，王拓個人所見所聞之事，內容抨擊歌功頌德的風氣，希望「大家把問題講出來吧！」，結果此文被情治單位認為刻意污蔑、抹黑蔣院長；而另外一篇是〈梁山泊的崛起與沒落——論水滸的「官逼民反」與宋江的領導路線〉，此文發表後不到一個月，毛澤東在大陸也開始批水滸，認為宋江的路線是投降主義，觀點與王拓不謀而合，結果此文也被情治單位指控與毛澤東隔海唱和、建立「造反有理」的理論基礎。<sup>42</sup>

由於這兩篇文章的發表，情治人員找上門來，並要求王拓簽立切結書，使得王拓曉得「從此，我知道要在文化界生存是很困難了。以當時國民黨對文化界控制之嚴苛，哪一家報紙的副刊敢登我的文章呢？如果沒有副刊的稿費，我怎麼可能靠寫作維生呢？於是，我決心改行向商場求發展」。<sup>43</sup>當「教書」、「寫作」兩條路都被斷絕了，原本只想「終生與書為伍」的王拓，也不得不投身商業社會。他先是透過觀察，有感於台灣醫療市場的改變，因此與台大醫院的醫師共同創辦《健康世界》雜誌，後來又轉任藥品公司經理。在藥品公司的那段時間，王拓表示自己感到非常痛苦，社會的現實與他當時滿腦子的左派理想相差太遠了，當他目睹商場中的爾虞我詐、缺乏理想與正義，只為了金錢、利潤相互鬥爭的殘酷面時，他認為「我在商場的那兩年中，正是我一生最感挫折、苦悶的時期」，一個作家在現實生活遭遇挫折時，往往卻也是他在創作上表現最為旺盛的時候，王拓亦是如此，「在商場的那兩年中……也是我一生中寫作最勤、創作力最強、作品最豐富的一段時間。」<sup>44</sup>，文化評論集《街巷鼓聲》及社會評論集《民眾的眼睛》裡的大部分文章，皆是在這段時間內所發表的，同時這也是《望君早歸》的創作背景。

筆者在前文曾經提及，就《金水孀》裡頭所收錄的篇章來觀察，可以發現王

<sup>42</sup> 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年5月），頁10-11。

<sup>43</sup> 同上註，頁11。

<sup>44</sup> 同上註，頁12。

拓的創作有從「前·現實主義」過渡到「描寫的現實主義」的現象，但是基本上在當時的作品中王拓大都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去「描寫」漁村漁民的種種，較少介入個人的批判與價值判斷。但或許由於生活現實的磨難，以及親身接觸社會當中的許多不公不義，因此到了創作《望君早歸》時，敘事的場景已由八斗子漁村轉到台北大都會，而主題內容也轉向刻劃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下爲了金錢殘酷鬥爭、爾虞我詐、人性扭曲的種種面貌。此時王拓的創作手法已較爲成熟，使得小說的篇幅普遍拉長，得以容納更多的場景、情節，同時他也透過一些小說人物的描繪與對話，開始介入個人的批判，使得其寫作風格由「描寫的現實主義」轉向「批判的現實主義」時期。

## （二）被扭曲的眾生相

在 1975 年 8 月所發表的〈金水孀〉，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王拓開始刻劃商業資本主義下人性扭曲的一面，基本上其寫作風格的奠定可由〈金水孀〉算起。而之後的 1976 年或許由於上述生活、職業的動盪變化，除了少數幾篇評論外，王拓並未發表日合文學作品，可說是其寫作——無論是創作或評論——都相對萎縮的一年。而到了 1977 年，王拓飽受壓抑的寫作欲望整個爆發開來，4 月有短篇小說〈春牛圖〉刊於《中國時報》，正式代表著經由〈金水孀〉的過渡，王拓的文學創作來到了「批判的現實主義」時期。而連續的 5、6、7、8 月每個月皆有短篇小說發表，並於 9 月集結出版即爲《望君早歸》一書。此外，這時他也使用各種筆名，於《中國時報》撰寫「人間方塊——關心人間」共數十則文章、在《夏潮》撰寫多篇社會評論，其內容涵蓋了學術、經濟、農漁勞工權益、環境污染……等等議題（後多收錄於《民衆的眼睛》）；而 4 月所發表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則引發了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9 月發表的〈擁抱健康的大地——讀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12 月發表的〈「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孫伯東「台灣是殖民經濟嗎？」讀後〉也意外在「鄉土文學」的論戰中引起了關於「依賴理論」、「台灣是否爲殖民地經濟」的論辯。王拓此時無論在文學創作、文化評論、社會議題的關注及論戰參與上，在在展現了一個「介入型」知識份子巨大的論述能力及實踐動能。

《望君早歸》收錄了五個短篇作品，依時間順序排列分別是：〈春牛圖〉、〈車站〉、〈望君早歸〉、〈獎金 2000 元〉、〈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其中除了紀念三哥而創作的〈望君早歸〉其背景是八斗子漁村外，其餘四篇作品的場景皆是繁榮的台大大都會。

由於王拓創辦《健康世界》雜誌及任職於藥品公司的關係，所以對醫藥界的陰暗腐敗面開始有所了解。「醫生」是社會的頂尖菁英，「藥品」則是民眾病痛時的最後保障，但是這兩個環節竟充滿著許多問題，王拓以一介懷有「左派理想」的知識份子投身格格不入的商場，面對這些醜陋現實不可謂不痛心，因此他在 1977 年 2 月的《中國論壇》上連續發表兩篇文章〈藥費為何這樣貴？——一個藥廠推銷代表的告白〉、〈崩塌的偶像——一個藥品推銷員眼中的某些醫師〉<sup>45</sup>，將藥廠與醫師之間的相互勾結、藥品成本轉嫁給患者導致藥費節節升高，以及醫生們接受藥廠的奉承巴結，幹出種種醜陋敗德的勾當，都一一揭露出來。而在 4 月所發表的〈春牛圖〉這篇小說中，他也將這些醜陋陰暗面刻寫於故事裡頭。

〈春牛圖〉篇幅不短，大致可以分為二部分，前半部描述劉昭男帶領新外務員趙秀燕穿梭於各大醫院、藥房中盤商，指導她認識藥品推銷業務；後半部則描述劉昭男與老闆邱德彰之間的鬥爭，終至離開公司，最後走上製造春藥兼營應召的非法一途。

王拓有意透過小說，揭露當時藥品推銷的黑暗面，例如：不降低藥品成本，反用色情月曆、書刊等旁門左道來做促銷、醫師們因為擁有藥品採購的決定權，藥商便給予回扣及酒色招待、並招攬頗具姿色的女外務員，暗示她們如果在「低薪資、高獎金」的狀況下欲使收入豐厚，便要多花心思、手腕去討好醫生，甚至與其發生不正常的關係。這些描寫都彰顯了商業社會中為了逐利不擇手段，導致荒謬醜惡、人性扭曲種種情況的發生，劉昭男在跑了一天的業務後告訴女外務員的話語，最足以說明此心態：「生意場裡就是這麼一回事，說穿了也不過就是酒色名利而已。只要懂得滿足對方，……這些想通了其實也沒什麼，人還不是都這樣，……爲了生活呀！」（頁 25）；此外，王拓在小說中也刻劃了商場上逐利鬥爭、爾虞我詐的一面，貫串〈春牛圖〉整篇小說的，其實是劉昭男與邱德彰兩人

<sup>45</sup> 二文皆收錄於《民眾的眼睛》（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8 月 15 日）。

之間的矛盾：當初劉昭男由於資本額不足，便找了邱德彰合作創立「華倫藥品公司」，本來說好公司登記兩個人的名字，而他的一半資金由邱德彰先代墊，日後再慢慢償還。結果邱德彰辦理公司登記時卻登記了獨資，雖然事後保證劉昭男擁有三分之一的股權，但是遲遲未有任何書面證明，而劉昭男也由於事業才剛起步，不好意思開口要求，結果拖延之下公司便成為由邱德彰獨攬大局的局面，也種下了兩人日後齟齬的火苗。後來由於在業務檢討會中，邱德彰提出了比過去更為苛刻的工作條件，劉昭男便聯合所有的業務員共同抵制，結果隔天邱德彰利用調薪將業務員們各個擊破，孤立劉昭男，兩人最終談判、然後破裂，劉昭男拿了三十萬元的和解費退出公司。幾個月之後，劉昭男四處奔波找尋工作，但都沒有著落，逐漸地連日常生活費也發生問題。此時有個藥房的高老闆找劉昭男合作製造春藥兼營應召，雖然劉昭男一度拒絕這項提議，但在孩子生病亟需住院卻付不出住院保證金的情況下，最後也不得不接受那違法的提議了。

何欣在〈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一文中，對〈春牛圖〉這篇小說有些評述：

他（劉昭男）拿了三十萬「骯髒錢」離開華倫。在想報復邱老闆而又無力的情況下，一家藥店的老闆要同他合作，做春藥偽藥，他斷然拒絕了，劉昭男表現得很有勇氣，為什麼最後又屈服了呢？當然，為了救兒子的命。作者既有意使他成為有道德勇氣的人，就不該屈服，能成為貧賤不能移的人才是。他的道德勇氣起不是又洩了氣？<sup>46</sup>

筆者認為何欣可能過於受制蔣勳〈台灣寫實文學中新起的道德力量〉<sup>47</sup>一文的觀點影響，誤以為王拓在此有意勾勒一個具有道德勇氣的人物角色。但其實在〈春牛圖〉當中作者無意讓劉昭男肩負任何道德責任或勇氣，縱使他似乎曾為了外務員被剝削而發聲，但那僅是為了拉攏外務員們以利於他向邱德彰做鬥爭而已。而在鬥爭失敗後離開公司，劉昭男卻由於放不下過去的「身份」、「地位」（同樣也

<sup>46</sup> 見何欣：《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台北市：遠景出版社，1979年3月），頁172。

<sup>47</sup> 蔣勳：《寫實文學中新起的「道德力量」》，序「望君早歸」，《仙人掌》2卷1期（1977年10月）。

是資本主義賦予人類社會的價值觀)，所以不願再去幹基層的外務員，認為那「比用刀子殺了他還使他覺得痛苦」(頁 51)，並且爲了維持昔日榮光的象徵，遲遲不願把汽車賣了，「站在路邊等公共汽車，左等又等車子老是不來，就讓他覺得好像一個人缺了兩條腿似的」(頁 52)，已經習慣「講究」的劉昭男，爲了維持身份象徵及生活的物質水平，結果「家裡每個月的開銷加上他的交際費用，汽車的保養費和油錢，每天只看到出的沒看到進的，他實實在在地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壓力不斷地在壓迫著他」(頁 51)。既不願委屈自己，日常生活又確實遭遇經濟困境，可以想見劉昭男最後不得不鋌而走險，幹起非法的勾當了。小說結尾處，劉昭男雖然答應了高老闆製造春藥兼營應召的合作提議，但內心依然升起了一股恐懼「他覺得四肢冷冰冰的，全身感到一種陰陰的寒意從心底升起來」(頁 78)，他是商業社會鬥爭下的失敗者、犧牲品，王拓在〈春牛圖〉這篇小說中所欲刻劃的，主要是商業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使人不知不覺同化於其中，然後最終將人給無情吞噬的那一面。

〈獎金 2000 元〉則是另一篇與藥品推銷有關的小說，在這個篇章中王拓所要刻劃的不是如劉昭男那樣的主管級人物，而是一個底層的業務員。鄭文良是藥品公司的推銷員，每個月的收入不豐，繳了房租以後僅夠他與太太兩個人溫飽。而公司最近宣佈了新制度，只要每個月業績最高的人，便可於薪水之外多獲得兩千元獎金，鄭文良一心一意想要得到這筆獎金，替即將生產的太太買件大衣，而在月底結算業績的前一天，鄭文良只要再收到泰順西藥房的支票，業績即可穩居第一。結果沒想到這家西藥房卻惡意搬遷，使得鄭文良不僅獎金泡湯，甚至必須因收不到帳連薪水都賠給公司，鄭文良十分著急，便去找泰順西藥房老闆的弟弟詢問，花了一個下午反覆地糾纏、爭吵之後，終於磨得那位弟弟無法忍受，透露出泰順西藥房已搬遷至宜蘭。結果鄭文良在夜晚視線不佳及滂沱大雨中，還是堅持從台北騎車去宜蘭收帳，回程途中發生了車禍意外，折斷了大腿。

筆者認爲，如果王拓寫作風格的奠定是在〈金水孀〉的話，則〈獎金 2000 元〉便代表著王拓在寫作技法及情節刻劃上，已經進入了一個成熟的階段。盧卡奇 (Georg Lukacs) 曾經在〈敘述與描寫〉一文中，對舉了左拉的《娜娜》及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兩部小說中關於「賽馬」的場景，來展現「自然主

義」(左拉)和他所讚揚的「現實主義」(托爾斯泰)之不同。對於左拉而言,他無微不至地在小說中描寫了關於賽馬的一切方面,但盧卡奇認為「這種精妙的描寫在小說本身中只是一種『穿插』。賽馬這件事同整個情節只有很鬆懈的聯繫」,但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賽馬卻是一篇宏偉戲劇的關節……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的全部關係通過這場賽馬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這場賽馬因此決不是什麼『譬喻』,而是一系列真正戲劇性的場景,是整個情節的關鍵」<sup>48</sup>。盧卡奇認為在現實主義的小說裡,任何的場景都會跟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而因為現實主義作家了解社會的發展規律,所以當他們要寫作場景時,他知道如何選擇,他知道必須拋棄和人的命運無關的部分,任何的場景如果跟人物的命運毫無關聯,就絕不會具有「詩意」。

就以上的角度來觀察王拓這篇〈獎金 2000 元〉,我們可以發現鄭文良或許有著千百次的收帳經驗,但是作者將他所描寫的這一次,擺放在鄭文良的命運關鍵處,原本再平常不過的收取支票過程,因為公司新頒發的獎金制度賦予了不同的意義,然後在此特殊意義下又導入戲劇性的無法順利收取之突發狀況,導致鄭文良被命運不斷拖拉、擺弄,在大雨滂沱下騎車奔馳於台北街頭,與老闆的弟弟反覆周旋,然後又在夜晚落雨之中長途奔波至宜蘭,終至發生意外。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或許會因為鄭文良的「命運」之不幸而悲嘆,但就如同盧卡奇所主張的,自然主義者「根本沒有考慮到社會發展的種種推動力及其對於生活表面不斷產生的影響。在這種孤立而抽象的觀察中,生活彷彿是一道一直向前流去的水流……」,而現實主義作家的不同之處,乃在於他們能夠理解洞穿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各種規律的作用(即所謂的「世界觀」)<sup>49</sup>。在〈獎金 2000 元〉中看似被不幸命運耍弄的背後,真正驅使主人翁在大雨中奔波而導致不幸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邏輯與制度。王拓在這篇小說中刻劃了七 0 年代私人公司「低底薪、高獎金」制度所引發的各種問題,「努力多、收入就多」看似十分合理,但是微薄的基本月薪卻使得底層勞工連三餐溫飽都不可得,然後為了獎金必須與同事鉤心

<sup>48</sup> 盧卡奇 (Georg Lukacs): 敘述與描寫,《現實主義論》(台北市:雅典出版社,1988年10月),頁15-16。

<sup>49</sup> 同上註,頁10。



鬥角、相互競逐，人性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逐漸扭曲變形，眼中僅能望見利潤與金錢，因此讀者所見的便是一個個被不良制度所驅動著的業務員，在街頭來回穿梭替公司賣命，然而一旦工作上發生了意外，竟連一點保障也沒有。王拓在小說中呈現出的另一重點，是七〇年代台灣底層勞工在職場上基本福利與保障的缺乏。陳漢德在故事中是鄭文良所指導的實習外務員，他目睹了鄭文良為達到公司的獎金制度最終車禍住院，於是開始詢問起公司的福利與保障，沒想到竟得到如此的答覆：

李先生也悄悄地說：「老闆曾經說過要擬一個規章，但是叫我擬我也擬不出來，已經快一年了，他也沒催，工作一忙我也就忘了。」

「這種事你怎麼可以忘記呢？關係大家的福利和保障」

「噯呀，私人小公司，能有什麼保障？」李先生說：「只有像你這種年輕人才會想得這麼天真！」（頁 112）

「私人小公司，能有什麼保障？」一語道破了七〇年代台灣底層勞工在職場上任人宰割的實況，鄭文良為了公司車禍住院，結果老闆只願意給他「留職停薪及兩千元醫藥費補貼」如此形同解雇的「補助」，導致其家庭連下個月的生活都將陷入困境，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面在此明白顯現出來。而原本僅是一切事件旁觀者的陳漢德，此刻終於也忍不住對著偽善殘忍的公司老闆發出怒吼了：

「走就走，你這種公司，媽的！」陳漢德指著老闆的臉大聲說：「你這個吃人肉、喝人血的東西，你媽的！你不是人！」（頁 115）

不同於以往的作品僅是「描寫」小說人物所遭遇的悲慘現實，在〈獎金 2000 元〉中王拓藉由陳漢德之口，對於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介入」了個人的價值判斷和批判。在小說末，他還刻意描寫了陳漢德將自己的薪水袋交給鄭文良的妻子，希望能幫助他們家暫時渡過下個月的難關，展現了冷酷的現實社會中，知識份子尚存的一絲溫暖與道德良知。

另一篇描寫具有道德力量正面人物的作品，是故事場景又拉回到八斗子漁村的〈望君早歸〉。在〈望君早歸〉的開頭有著獻詞：

僅以這篇小說紀念遭遇海難以歷七年的三哥，並向含辛茹苦撫育姪兒姪女成長的三嫂，致最深的敬意。(頁 189)

王拓的父親在其小學六年級時過世，家裡的經濟重擔便由其三哥（跑遠洋的拖網船）一肩挑起<sup>50</sup>，因此王拓在這篇小說中基本上是以受難者家屬的身份，刻寫自身及家族的親身經驗。小說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突顯了討海人家的辛酸，不只是走船的船員辛苦，每當出海作業時，家屬也時時刻刻擔憂船員的安危，一旦有颱風消息便食不下嚥，只能仰天祈求上蒼保佑別讓意外發生；故事的後半部，則是描述華豐一、二號船隻在巴士海峽上遭遇到颱風，與船公司失去了聯繫，但是船公司卻不把人命當作一回事，不斷地拖延、敷衍。

其實關於「海難」，王拓在 1973 年的〈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八斗子訪問實錄〉一文中已提及許多問題，如：氣象報告的準確性、改良船上的通訊設備、漁會無法替漁民爭取利益，甚至藉海難發「保險財」的惡劣行徑……等等，而王拓在這篇〈望君早歸〉便嘗試將上述議題鑄進小說裡，尤其是藉由邱永富這個具有抗爭力量的知識份子角色，揭露漁會與船公司互相袒護包庇、枉顧漁民性命的醜惡行爲。

有別於以往刻劃漁村的小說，皆是有距離地描寫漁村的困苦及人們面對命運不上不下的兩難處境，在〈望君早歸〉裡王拓固然有意傳達討海人的血淚心聲，但他真正的重點是要刻劃實實在在展開批判、鬥爭的知識份子角色。小說中的邱永富是在漁會工作的職員，由於自身也曾是受難家屬的經驗，因此當漁民權益受損或海難發生時，他總將漁民的困難視作如同己身遭遇，勇敢地跳出來替漁民發聲，對於船公司想安撫而施放給他的各種利益，也總是能夠不爲所動。在小說中「華豐一、二號」發生事故以後，邱永富帶領著受難家屬做持續地抗爭，希望船公司能派遣船隻及租飛機到海上搜尋生還人員，但船公司虛以委蛇想用少量的金

<sup>50</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5。

錢賠償了事，邱永富便大膽揭露了船公司代替船員保意外險，欲藉由船難發一筆「保險財」的陰險事實。這種種的抗爭，突顯了知識份子與民眾形構成聯合陣線、共同對抗資本家邪惡剝削的動向。

比較有意思的是在小說後頭，由於長期抗爭的疲乏，船公司對於受難家屬各個擊破，因此大部份家屬領了賠償金草草了事，令邱永富感到十分失落。在失望之餘，他依然認為：

他（邱永富）雙手握著拳頭，堅定地說：「不拚就永遠沒有出頭天，永遠被這些船頭家吃得死死的。而且，司法機關也在調查了，船頭家難道不緊張？只要成功一次，開一個先例，以後才好過日子！」（頁 241）

王拓在此表現了知識份子不願妥協的正面道德能量。但比較令人好奇的是，為何小說需要有這樣一段的情節處理呢？當然，或許當年其三哥的海難事件最後處理方式即是如此，因此王拓便如實地寫進小說中。但是這不禁令人思索，如此的情節設計：知識份子選擇與民眾同一陣線，但是最後民眾卻背叛了知識份子，是否在王拓的認知中對於民眾一直是缺乏信心的？民眾其實是需要被再教育跟再啟蒙才足以成事的？而肩負起這個指導任務的角色，便是知識份子。筆者認為如此推論應具有一定程度的真確性，因為日後王拓由文學躍身政治領域，與此部分有著內在思想上的聯繫關係。

而〈車站〉這篇小說，是王拓 1977 年的作品當中篇幅最短的，內容的人物角色沒有姓名，場景也僅在「車站」，其描繪的是商業社會下的一幕悲劇：男人被工廠裁員而失業，拿妻子賺回來的錢買醉，並對妻子拳打腳踢，妻子難以忍受抱著懷中的嬰孩逃離家門，小說描寫的便是男人在車站苦苦哀求妻子回家的場面，她本來是不肯妥協的，但是後來由於擔憂留在家中的孩子，因此還是回家了。筆者認為此篇小說的藝術手法並無特殊之處，在內容議題的鋪寫上作者可能也沒有很大的企圖心，就僅是以淡淡筆調描繪商業社會中一個失業家庭的窘境而已。小說中或許提及了七〇年代少見的「家暴」議題，但是很可惜地這部分妻子的抗議被擺置在丈夫失業的無奈，以及自身最後的妥協返家之下，整體的控訴力道便

被收攏在商業社會的悲歌裡頭，不具有太多實質的開創意義。

而王拓七〇年代最後的一篇小說作品是〈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內容則回到了刻劃校園中的知識份子。李文學是台北市一所中學的國文老師，本來充滿著理想與抱負，他曾任教於花蓮某中學，但由於在校園刊物上發表了〈胡適——一個新文化的開拓者〉，推崇胡適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宗師，引起同校國文老教員的不滿，與之發生口角爭執，甚至最後有兩位情治人員到校關心，欲收取李文學過去發表之文章回去「拜讀研究」，使得李文學身心遭受重大打擊，生了一場重病後從此意志消沉。但是回到台北這所中學後，整體環境的氣氛卻又令李文學不甚滿意，「花蓮的人倒還有點人情味，而台北——噢！什麼都是錢呀！老師們還在學校裡作股票生意、推銷珠寶」（頁 174），之後李文學愛慕同事又不可得，只得喝著酒和著眼淚，逐漸沉入夢鄉……。

在七〇年代前期王拓發表的〈祭壇〉裡頭，描寫了知識份子一心一意想透過奉承師長、攻擊同儕而獲得留校教書機會的醜陋嘴臉，王拓以其本身待過教育圈／學術圈的經驗，總是能將這類角色的幽微心理刻寫得入木三分。而在這篇〈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中，李文學這個角色的內涵意義也相對更加豐富，筆者認為他是一個「既令人同情但又不討喜」的人物。王拓一方面設定他本來是個滿懷雄心壯志的年輕人，乃是由於遭受了國家機器在思想方面的控制與打壓，才導致噤聲而意志消沉，滿懷熱情的理想主義者最終回到台北，卻又由於整個商業社會只重視金錢利益關係，更使得他鬱鬱不得志，「他（李文學）覺得好像有一片什麼巨大的無所不在的黑暗的東西在迫害著他，使他身心都活潑不起來」（頁 175）。這所謂「巨大無所不在的黑暗東西」指的應該就是國家機器對於言論思想的高壓管控，再者就是整體社會朝向資本主義化所顯露出來的金錢觀與人際關係的疏離。基本上〈一個年輕的中學教員〉是王拓七〇年代第一篇（也是唯一一篇）指涉到政府管控人民之情節的小說作品，在此我們可以觀察到王拓八〇年代政治小說寫作的粗胚已隱約成形了；李文學遭受打壓導致意志消沉固然令人同情，但王拓另一方面又虛寫（在小說中從未真正現身）另一位教工藝的孫定一老師，來與其做對比，突顯出李文學那種高高在上、眼高手低的知識份子習氣。孫定一傳達給學生的觀念是「手腦並用、雙手萬能」，而李文學去工藝室參觀展覽，看到學生

作品是具象的「農人耕田」、「教室掃地」、「礦場煤車」……時，則嫌其太俗氣、缺乏靈性；學校裡的訓導主任時常有不當體罰學生的情形，孫定一會勇敢地跳出來與訓導主任激辯爭執，而李文舉卻只願躲在人群當中嚷嚷著：「毫無道理，毫無道理！」。筆者認為王拓在小說中刻意區別出知識份子兩種不同的行徑，李文舉的遭受打壓而英雄氣短固然令人同情，但是他懷抱著高度自我意識，瞧不起落後的鄉下（他曾任教的花蓮）、瞧不起勞動與庶民生活、不願與廣大的民眾站在一起，只願躲在自滿又失意的雙重情緒中，不斷複誦著口頭禪：「毫無道理，毫無道理！」，最終其自身遭遇到無盡挫折、失落也就不再那樣令人同情了。在這篇小說中，王拓暗示著真正的知識份子不應只是懷抱著理想、整天高談闊論，最重要的是必須具有「實踐」的行動力，不能只侷限於自身的象牙塔，應走出來與廣土人民同在。

### 第三節 從「保釣運動」到「美麗島事件」： 王拓七〇年代的行動實踐與思想軌跡

#### 一、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都是在這個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

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政治與文化變遷的關鍵時期，也是王拓個人生命歷程中相當重要的十年，要談這時期王拓的思想形構及演變軌跡，便必須談到七〇年代初期台灣遭逢的一連串危機事件（釣魚台主權爭議、台灣退出聯合國……等），對王拓及其同世代青年造成的衝擊與啓發<sup>51</sup>。王拓所屬的「戰後世代」，無論本省或外省籍，即使不在台灣出生，也幾乎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成長，並在國民黨體制下接受教育，到了七〇年代初期大約是在20到40幾歲之間，由於遭逢了上述的重大傷痛事件（traumatic events）而歷經覺醒過程，使得他們由消極的「自在世代」（generation in-itself）轉變為積極的「自為世代」（generation for-itself），成為七〇年代挑戰既有政治體制與文化傳統的主力。<sup>52</sup>當然，就此世代而言，他們在面對釣魚台事件、台灣退出聯合國等傷痛事件而激發出的強烈世代意識，其主要參考架構，是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主、關於近百年來中國國族命運的歷史敘事，因此「保釣之所以能成為校園行動主義的導火線，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挑起的是民族主義的熱情。而台灣的教育體系裡本來就充斥著民族主義的語彙、論述，於是一觸即發，民族主義變成是最有效的動員催化劑」<sup>53</sup>。

王拓早在唸師大的時候，便因為到台大聽殷海光的課，以及幫忙推廣《新希望》雜誌，因此結識了王曉波、陳鼓應、蘇慶黎等台大哲學系的朋友，大夥兒時常聚在一起閱讀、討論，使其對於社會政治事務有所接觸與認識，也因為自由主

<sup>51</sup> 王拓曾不只一次提及這些事件對於他（們）的意義：「我和我的許多朋友們都是在這個運動中被教育過來的人，而今天社會上普遍高漲的民族意識，也正是當年的這個保釣運動所激發起來的。」（語見 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他們喊出了『釣魚台是我們的！』而引發了全世界中國人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這個運動教育了當代大多數的中國青年，也教育了我！」（語見《民眾的眼睛》自序，頁2）「在我大學畢業讀研究所時期，台灣發生了保釣運動，那對我影響很大」（語見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的「訪王拓」部分，頁60）。

<sup>52</sup> 相關論述可參見蕭阿勤：《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9期（2003年6月）。

<sup>53</sup> 見楊照：《在歷史的洞穴裡——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調查、平反》，《倉皇島嶼》（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11月1日），頁100。

義的薰陶而有了些反權威的思考<sup>54</sup>。不過就王拓生命歷程的表現來看，他較為明確且正式的實踐行動之展開，還是要從當完兵去政大唸研究所以後開始算起，而這當中給予他個人及同世代青年最重大刺激的，當然就是「保釣運動」。<sup>55</sup>

1969年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發表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台灣東北部釣魚台列嶼附近蘊藏有大量石油，1970年9月日本外務省宣稱釣魚台的領有權屬於琉球，而戰後託管的琉球即將歸還給日本，因此日本自然擁有該列嶼的主權，而美國之後也發表了同樣有利於日本的聲明；該年底，又發生了日本警察拔除釣魚台上的中華民國國旗、宜蘭縣漁民在釣魚台附近作業遭日艦驅逐等事件，雖然國民黨政府不斷聲明釣魚台列嶼的主權屬於中華民國，但由於爭取釣魚台主權的態度過於遲緩及曖昧，國內輿論開始出現批評聲浪。此時島內由於威權體制的束縛，在台灣的青年們並不是那樣具有「反叛」的行動力及本錢，但是對於出國留學的學生（尤其是留美）而言，美國六〇年代反越戰及新左派的學生運動給予他們不同的視野與啓發，因此當他們得知了相關消息後，便開始於全美各地串聯，決定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並在1971年1月與4月在全美幾個大城市舉行示威遊行，「這個運動先在美國引發，續而波及歐洲，造成中華民國海外留學生一次空前的大串聯與大團結……這個運動雖遭國民黨政府大力封鎖，但是終於還是『紙包不住火』，島內的知識青年也從這個事件中看清了美國與日本相互勾結侵略中華民國的醜惡面孔，而使我們長期在美日兩個的經濟侵略下昏睡已久的民族意識覺醒了！於是，在國民黨統治下幾十年難得關心國是的大學生們，也紛紛在校園舉行國是座談、學術演講與示威遊行」<sup>56</sup>。

在筆者訪談中，王拓表示「保釣運動」的時候，基本上他是一個「跟隨者」、

<sup>54</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9-10；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的「訪王拓」部分，頁60；另外蘇慶黎也曾表示：「重考上台大哲學系。我在校園認識一些朋友，像王杏慶、王曉波、徐正光、王順、邱立本、王紘久——就是王拓。王拓是師大的學生，後來讀政大中文研究所，當時他還是一個很害羞的文藝青年。」，見《從社會改革者走向美麗島：蘇慶黎，〈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29日），頁112。

<sup>55</sup> 蘇慶黎認為：「『釣魚台事件』時，才真正讓我們把帝國主義跟中國、台灣的關係聯繫起來。我相信在我們這些人裡面，真正能把台灣跟整個外在世界緊密地聯繫起來思考，『釣魚台事件』的刺激絕對是一個關鍵」。同上註蘇慶黎該文，頁112。

<sup>56</sup> 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年5月），頁6。

「學習者」，此時由於海外消息被封鎖住，因此他透過王曉波、陳鼓應等私人通信管道，獲知一些海外的訊息<sup>57</sup>；類似的經驗在鄭鴻生（當時就讀於台大哲學系）的著作中也可以發現：「我們在流入島內的海外保釣刊物上，讀到了這些前輩開始發展出來的批判帝國主義霸權的第三世界左翼立場，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發展自然給了我們很大的啓示與鼓舞」<sup>58</sup>。這一波在台大校園裡所掀起的保釣運動風潮裡頭，有一個共識主軸其實正緩緩的集結運作著：以台大哲學系師生為主，加上徐正光、鄧維禎及王拓等人，藉著不斷閱讀由海外保釣滲透入台灣的資訊，逐漸集結成一個小群體，成為強調民族主義同時具有素樸社會主義的一群。<sup>59</sup>

不過，海內外的保釣運動雖然有著私人管道的信息傳佈、互通有無，但畢竟二者的環境背景不同，所以在運動方向上也發展出不同路線。海外留學生的保釣運動在1971年9月的「安娜堡國是會議」後，轉向了「中國統一運動」。在文革真相尚未被揭露出來以前，留學生當中不少人是傾向認同於中共的，認為「真理在海的那一邊」<sup>60</sup>；而在台灣島內想走這條路，便必須立即面臨監禁與死亡的威脅，因此沒有多少人膽敢認真去行動。島內的保釣運動主要是帶動了日後的校園民主運動，並與當時的《大學雜誌》有所呼應，追求社會政治的改革，其立場是比較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保台」主張。

1949年後約二十年間，國民黨政府灌輸給民眾不容質疑與挑戰的右翼中華民國立場，到了七〇年代初期由於外交失利、對岸中共的崛起，以及左翼思想的火種由海外逐步滲透進台灣，黨國威權體制開始出現了鬆動崩潰的危機。當一元化的思維被打破，知識青年們對於「中國」此一詞語的概念及認同也開始出現多元的面貌。在保釣運動中，由於國民黨政府長期躲在美國羽翼之下的面目被揭穿，而美日帝國之間對於釣魚台列嶼的「私相授受」又激發起「中華民族長期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此「中共當時以其站在第三世界弱小國家的

<sup>57</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9。

<sup>58</sup> 見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1年12月），頁127。

<sup>59</sup> 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64。

<sup>60</sup> 見劉大任：《不安的山——記七〇年代的一次旅行》，收錄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12月10日），頁74—75。



立場發言」，給予了海內外知識青年們「一種充滿理想的另類視野」。<sup>61</sup>

必須要辨明的是，相較於國民黨政府對釣魚台處理態度的曖昧及軟弱，此時對岸中共以其第三世界受壓迫者代言人的立場發聲，並且挾帶著長期以來台灣社會所缺乏左翼思想的隱約召喚，固然對於知識青年們有著相當程度的吸引力，不少人因此比較認同所謂的「社會主義中國」，但是其實他們各自認同的理由還是呈現紛雜不一的情形：基本上以民族主義為動力所發展起來的「保釣運動」，不少人期盼追求的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尤其在民族主義者的敘事情節當中，擁抱「強大的中國」能夠替長期以來「飽受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伸張正義、找回昔日的光榮；但是在另一些人的思考當中，「強大」及「民族情感」似乎並不是他們嚮往中國的理由，能夠召喚他們的是左翼的理念、弱勢者反壓迫的信息，如鄭鴻生便表示：「人民若不得解放，國家強了又如何？一個『強大的中國』對我們而言除了個人心裡層次的滿足外，不必然帶給人民實質的解放與幸福」、「經由保釣運動的發展，文革『反封建』與理想性的那一面越洋影響了留學美國的台灣子弟，再回過頭來彈到台灣，撞擊到我們身上。新中國不是以其強盛，而是以其對理想以及對新社會新人類的追求吸引了我們。」<sup>62</sup>，而王拓也認為「我對中國的嚮往純粹是因為他的正義甲理想，我無那種民族的感情啦，我對中國共產黨沒有那種民族的感情」<sup>63</sup>。當然，「左翼理念的嚮往」及「中國民族的情感」未必能夠全然二分，例如陳映真、陳鼓應等人在面對文革所曝露出來的真相時，王拓便認為他們「比較陷於一種比我更為矛盾或者痛苦的狀態」。<sup>64</sup>

大致上「保釣運動」所挾帶對於「社會主義中國」的認同，無論是海內外都在 1975 年左右隨著文革真相的曝露，有了一定程度的幻滅。在海外的保釣運動由於見到「越共的最後勝利導致南越解體和後來的船民大逃亡，柬共的勝利帶來人類史上罕見的大屠殺，然後是『四五』天安門事件及四人幫倒台，這一連串的大曝露直接使大家追問反省整個意識型態以及運動本身的行動邏輯」<sup>65</sup>，而王拓

<sup>61</sup> 見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01 年 12 月），頁 127。

<sup>62</sup> 同上註，頁 81、141。

<sup>63</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2。

<sup>64</sup> 同上註，頁 12、13。

<sup>65</sup> 見水秉和：《保釣的歷史回顧》一文，刊於《當代》雜誌第 2 期（1986 年 6 月 1 日），

也透過許多書籍逐漸認知到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殘酷批鬥著第一代的革命家、把早期參與革命，在白區做地下工作的人講的話，拿出來作為批判的材料……等等），促使他開始檢討中國共產黨，他認為當時中國大陸的政府是有問題的，共產黨的理想已經失落了。<sup>66</sup>

## 二、一步步踏進現實：《大學雜誌》、《文季》與王拓

除了「釣魚台事件」以外，台灣在七〇年代初期尚遭逢了許多外交及內政上的危機，這部分筆者於第一節已有論述，此處不再多談。在如此內外交逼的危機之下，知識份子們對於社會、政治的關心急遽提升。海外釣運在發展了一陣子之後轉向「統運」，而島內則是引發了內政革新的呼求，尤其是以學生和大學教授為中心的知識青年們主張，要因應外交困境必須先厚植國力、必須在內政上徹底進行革新。此時關切社會政治改革者大致可分為兩區塊，一部分是以台大為主的青年學生們，透過社團、刊物對校園教育、社會政治問題展開熱烈關懷與討論；另外一方面，則是改組擴充後的《大學雜誌》<sup>67</sup>，利用國民黨內部政權轉移的機會（蔣經國準備接班），要求政府進行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面的「革新保台」。這兩個區塊並非截然二分，《大學雜誌》中的陳鼓應、王曉波本身是台大哲學系的老師，同時也是此時台大校園運動的指導者，而在1971年底，台大要求改革的主要學生與《大學雜誌》人士往來更形密切，1972年元月《大學雜誌》第二次改組，便涵蓋進五位台大學生<sup>68</sup>。七〇年代初期年輕一代本省籍民意代表所領導的黨外反對政治運動，尚處於起始階段，這時激發台灣社會改革熱望的重心，毋寧更圍繞在《大學雜誌》的學生與知識份子身上<sup>69</sup>。當然，也因為《大學雜誌》與校園運動有逐漸合流且壯大聲勢的跡象，蔣經國在擺脫黨內大老的箝制，內閣權力逐步穩固後，便開始分化解散《大學雜誌》成員。在1973年警總拘留陳鼓

---

頁 62—72。其內容對於「海外保釣」與「文革」之間的行動邏輯及意識形態之關連，有著清楚明白的闡述。

<sup>66</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2。

<sup>67</sup> 《大學雜誌》創刊於 1968 年元月，1971 年元月改組擴充，網羅了當時台灣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代精英上百人。

<sup>68</sup> 此五人為王杏慶、錢永祥、陳玲玉、王復蘇、洪三雄。

<sup>69</sup> 蕭阿勤語，見《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一九七〇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第 9 期（2003 年 6 月），頁 28。

應、王曉波、錢永祥等人及「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這一波「行動主義」便逐漸消沉，而《大學雜誌》也內縮成爲不具有批判異議色彩的刊物。<sup>70</sup>

而 1970~73 年左右的王拓，基本上扮演的還是比較接近於「學院知識份子」的角色，一方面他正在政大中文研究所攻讀碩士，畢業後留校擔任講師；另一方面則開始創作、寫文學評論、編輯文學雜誌。此時的王拓已在《大學雜誌》上有過連名的文字，也曾經撰寫幾篇報導性質的文章<sup>71</sup>，但如他所言，基本上此時還他是一個跟隨者、學習者，他與陳鼓應、王曉波、蘇慶黎、王杏慶等人友好，在閱讀討論、交流互動、支援校園活動中轉換自己的視野，一步步將眼光投注社會現實中，蓄積批判改革的能量。

在一些訪談紀錄中，王拓都曾經表示「保釣」及「回歸現實」風潮所掀起一波上山下海的運動（如校園的「社會服務團」、「百萬小時奉獻運動」……等），帶給他的啓發及影響。他認爲：

關心社會關心什麼呢？自然又會去關心工農階層的人，因為這群人從五〇、六〇年代中，台灣的工商業經濟起飛時候，被犧牲最大的一群人 很多知識份子都是從這個階段來的，像我這樣，很自然就會注意這個角落，那就展開了上山下海的運動，整個保釣運動慢慢發展成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味道 這些上山下海的運動，可能在思想上給我一些衝擊跟啟發，開始我就自覺地應該為他們做一些事情。<sup>72</sup>

雖然王拓此時透過教育升學，已經脫離貧苦漁村，但是在他成長過程中所接觸到階級不平等的現象、對於底層民眾生活勞苦的記憶，使他能夠立即與此時的社會氣氛有所感知、交集，他稱自己那樣的成長經驗與認知是所謂的「土左」——農

<sup>70</sup> 《大學雜誌》整體的發展脈絡，可參見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 40 年》（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87 年 10 月）。

<sup>71</sup> 王拓（等十五人連名）：《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刊於《大學雜誌》46 期（1971 年 11 月）；王拓：《漁村問題所反映的民心——八斗子訪問實錄》，刊於《大學雜誌》69 期（1973 年 3 月）；《請確實保護「勞工權益」——從亞洲航空公司的勞資糾紛說起》，刊於《大學雜誌》75 期（1974 年 7 月）。以上皆收錄於《民眾的眼睛》。

<sup>72</sup> 見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的「訪王拓」部分，頁 60-61。

村、漁村、礦工這些人現實的生活，跟他們的願望……這些東西我們看起來都是所謂左翼的東西……這些思想不是來自書本的、來自馬克思的，也不是來自中國左翼政府思想教材，這些我都沒有看過，完完全全是台灣在五〇年代到六〇年代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裡面，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sup>73</sup>——也因為有這樣「土左」的成長經驗及思維，使得日後的王拓特別關注於「階級」議題，並且透過一些管道獲取左翼思想的書籍後，能夠為自己的「土左」鋪展出更為理論化的主張。

王拓一步步投身現實的發展軌跡，除了「重大傷痛事件」及社會氣氛的轉變所帶給他的衝擊之外，對於一個中文系出身、此時正嘗試寫作的知識份子而言，七〇年代文學典律的轉變——「現代主義」文風遭到「無根放逐」的批評，「現實主義」作品（鄉土文學）逐漸成為文壇主流——自然也是影響他思考的重大因素之一。筆者在上節中已談及了王拓現實主義文學觀的發展情形，也論及了其與「文季」系統有著類似的變化軌跡。

所謂的「文季」系統，可由尉天驄於1959年接辦《筆匯》開始算起，期間歷經了1966年的《文學季刊》、1971年《文學》雙月刊，以至於1973年8月登場的《文季》。其中最早的《筆匯》創刊於1957年，1959年由尉天驄、許國衡接手，由於「其身處資本主義文化傾銷的時代裡，不可避免的仍有相當西方虛無主義蒼白的色彩」<sup>74</sup>，《筆匯》基本上比較接近於綜合性刊物，而《文學季刊》則偏重於文學。1966年創刊的《文學季刊》開始從現實社會中找尋材料，顯得與其它學院派的刊物有所不同<sup>75</sup>，但是《文學季刊》尚不排斥一些實驗性的作品，具有相當程度的折衷和過渡色彩；《文學季刊》在1970年2月出版第10期後因經費問題而告中斷，一年後改名為《文學》雙月刊重新出發。《文學》雙月刊相較於前期的《文學季刊》其「自覺性」要明白得多，雜誌同仁也比較敢於表白他們的立場；而到了1973年8月的《文季》時，呂正惠認為它鮮明地表現出三點特色：首先它有了發刊詞，向台灣宣告了第一個現實主義文學團體的存在；其次

<sup>73</sup> 同上註，頁61。

<sup>74</sup> 郭紀舟語，見《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47。

<sup>75</sup> 見王拓：《一步步踏進現實的世界》 訪問尉天驄，收於尉天驄著《民族與鄉土》（台北：遠景出版社，1981年6月）。

它以相當猛烈而集中的砲火攻擊現代主義文學，如唐文標在第一期裡的〈詩的沒落〉便對於現代詩的種種弊病加以追擊；第三，《文季》裡頭開始出現一些意識形態掛帥的作品。雖然《文季》僅出版了三期，但是在它停刊時（1974年5月），文壇的氣候已完全改變了，這時「鄉土」與「現實」已不再成為禁忌。<sup>76</sup>

王拓在1970年進入政大中文研究所就讀，尉天驄時任講師，兩人保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王拓於此時開始創作小說、寫文學評論，「文季」系統的發展脈絡勢必對他有所影響。而到了1973年，尉天驄欲嘗試將《文季》重新恢復時，便找了王拓擔任雜誌的編輯之一，因此《文季》的文風及「現實主義」的價值觀更是影響王拓至深，他自身的短篇小說〈炸〉、散文〈廟〉及評論文字〈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也刊載在《文季》中，宣告著王拓的創作軌跡由早期的「前·現實主義」轉變為「描寫的現實主義」。

### 三、集結與分裂：知識份子的路線問題

南方朔曾將《大學雜誌》裡知識份子的聯合分裂過程分為四個階段：（一）初創期；（二）大聯合時期；（三）「土」「洋」內鬥時期；（四）「土」「土」分裂時期。<sup>77</sup>「初創期」指的是從1968年創刊到1971年改組前的這段時間，其內容性質比較接近於小型的同仁雜誌，沒有較敏感或高層次的論政<sup>78</sup>；而「大聯合時期」指的是改組後到1973年初這兩年間知識份子的集體論政，此「大聯合」之所以能夠成功，與蔣經國正面臨接班問題有關，他以「鼓勵青年人應多講話」來形塑其開明形象，知識份子們的集結某程度上是受到國民黨鼓勵、默許的。而改組後的《大學雜誌》也開始提升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切；知識份子們此時雖集結於《大學雜誌》之下，但是他們彼此間卻存有相當大的「異質」性，其中出國留學放洋的一系（洋系），其思考是比較官方式的，保守性格也較為強烈，在處理實際事務上比較強調高層次的理念，與「土」系成員的作法扞格不入；另外，在

<sup>76</sup> 見呂正惠：七、八十年代台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 一文，原刊於《新地文學》1卷2期（1990年6月），後收錄於《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7月），頁55-57。

<sup>77</sup> 見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 《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收錄於《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台北市：四季出版公司，1979年9月10日），頁13。

<sup>78</sup> 見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40年》（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87年10月），頁90。

蔣經國內閣逐漸穩定的同時，「洋」系學者如孫震、李鍾桂、關中等人不斷被拔擢進入政府組織，也引發了「土」系內部對政治有權力慾者的怨懟，而造成「土」「洋」內鬥，終至分裂<sup>79</sup>；而繼「土」「洋」分裂之後的「土」「土」再度分裂，南方朔則稱之為「功利的」與「非功利的」兩條路線之爭。到了1973年下半年的《大學雜誌》，大致上已失去了過往「大聯合」的聲勢和立場，因此「土」系中有若干人轉而傾向於求助新興的資產階級，極力主張藉由選舉進入決策層，有著相當明顯的功利目的，引發了另一批「非實利主義者」的排斥，造成「土」系的再度分裂。而其中這些排斥者正是「從保釣運動到台大哲學系事件，正在不斷形成的左翼意識形態」。<sup>80</sup>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描述《大學雜誌》知識份子的聯合與分裂過程，乃是因為透過這樣的認識，我們可以發現七〇年代後半期，包括「鄉土文學論戰」及黨外運動中幾條不同的路線主張，此時已經隱然成形了。其中包括了「洋」系一派官方式與親官方的思考、「土」系裡與中產階級結合的選舉路線思考，以及另外一批反資反帝的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派的思考，而王拓乃屬於最後一派。

許瑞浩曾在一篇論文中對1975年以前台灣的社會結構變遷有所描繪，他認為從六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便逐步產生了「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這兩類「在近現代史上從未出現過的社會階層」<sup>81</sup>，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觀察角度。然後他又認為由於生活水準與知識水準的提高，使得「知識份子」的人數在七〇年代也快速增加，成為頗具規模與影響力的社會階級及社會力量，並從七〇年代中期開始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力。他並引用王振寰的說法認為這三者之間隱約有種分工：知識份子主要的領導者與設計者、中產階級是主要的資源供應者、勞工階級則為主要的選民，共同構成反對

<sup>79</sup> 除了「土」「洋」思想及行事差異所造成的矛盾之外，南方朔也指出1973年後因某些《大學雜誌》成員急欲介入並領導日正昌熾的學生運動，導致國民黨因疑懼此一運動的發展而撤離對《大學雜誌》的支援，而「大學集團」中妥協度較高的「洋」系成員，為求明哲保身也隨之撤出。見南方朔：《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台北市：四季出版公司，1979年9月10日），頁21。

<sup>80</sup> 郭紀舟語，見《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39。

<sup>81</sup> 見許瑞浩：《台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第2期（2002年12月），頁253—254。

運動的社會基礎。<sup>82</sup>

筆者認為上述的分類分工固然有其表面上的準確性，但如果仔細探究下去卻使人不禁想問：知識份子是否能稱得上是一個「階級」？七〇年代的知識份子固然擁有較高的知識與理性思維，在行動主張上也足以構成有別於勞工或中產階級的「特殊社群」，但是其在物質基礎上實無法稱得上是一個所謂的「階級」。也因此知識份子在面對七〇年代新興的「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時，為了獲得支援支持（無論是金錢或是選票），它便必須選擇認同於其中一者的意識型態價值觀，進而與之結合而順利發展出自身的行動路線。由此可知，如果除去親官方陣營不論，由於知識份子分別與新興的兩個階級結合，七〇年代的反對陣營裡也逐漸發展出兩條不同的路線。

1974年《大學雜誌》分裂後，由張俊宏及政治人物康寧祥、黃信介所創刊的《台灣政論》（1975年8月～12月，共五期），曾經一度集結了走出學院藩籬的知識份子。此時的《台灣政論》「秉持自由主義的精神，包容各種黨外不同的聲音……統派或左派的陳鼓應、王拓、蘇慶黎、陳玉璽等，都曾參與撰稿」<sup>83</sup>，短短五期的《台灣政論》形成了反國民黨在野人士第一次的大集結<sup>84</sup>。但由於其在1975年底的停刊，使得黨外陣營的異質傾向再度分裂開來，逐步形成日後「這一代」與「夏潮」兩條不同的路線主張。<sup>85</sup>張俊宏在1977年創辦的《這一代》，

<sup>82</sup> 王振寰：《台灣的政治轉型與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卷1期（民國78年，春季號），頁95-97。

<sup>83</sup> 許瑞浩語，見《台灣政論》的初步分析——以「自由化」、「民主化」和「本土化」為中心，《國史館學術集刊》第2期（2002年12月），頁271。

<sup>84</sup> 陳鼓應曾對於《大學雜誌》成員及其後發展做出一些分類：

- （一）新保守主義派：關中、魏鏞、李鍾桂等，有的被當局吸收，有的則納入黨政高層。
- （二）學院式的自由派：楊國樞、金神保、王文興等，其言論表現了學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
- （三）地方政治派：張俊宏、許信良，與地方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結合，創辦《台灣政論》，僅五期被停刊，後再由張俊宏接辦《這一代》。
- （四）社會民主派：王拓、王曉波、陳鼓應、王杏慶，參與後來蘇慶黎辦的《夏潮》雜誌，和另一些作者陳映真、王津平，具有共同的社會改革思想傾向。

其中比較親官方的屬於第（一）（二）派，而所謂「反國民黨在野人士的大集結」則以第（三）（四）派的人士為主。參見陳鼓應：《七十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香港《中報月刊》（1982年5月28日），頁32。筆者乃轉引自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71-72。

<sup>85</sup> 關於思想路線上的不同，王拓在談到《台灣政論》時也曾言：「那時候大家的思想、觀念、意識型態不是很相似，他們（筆者按：指張俊宏等人）是屬於中產階級的人，

可說是知識份子與中產階級結合的政治選舉路線；而蘇慶黎在 1976 年接辦的《夏潮》<sup>86</sup>，則給予了「社會民主派」一塊論述的園地。

#### 四、「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派理論大將王拓

在七〇年代前期的動盪歲月下，王拓透過與朋友交流互動、活動參與、書籍閱讀逐步拓展自己的知識視野，並藉由小說作品、評論文字傳達他對於窮苦大眾的關懷。就小說及評論文字的內容觀來，王拓自 1973 年以後已明顯擺落了過去學院派「唯心論」的傾向與浪漫色彩，而逐漸能夠掌握社會歷史變遷背後的動力所在。但也因為小說及評論反映了漁民們在現實生活中的血淚掙扎、批判政府各項措施之不當，因此 1974 年王拓也遭遇到類似「台大哲學系事件」的整肅，其於政大中文系的教職在不明原因下被解除，爾後只得轉任光武工專教師。在光武工專時又因為「學生紀錄上課講話」的風波，導致他心灰意冷，遂離開教育界，投身商場。

對一個本以教書寫作為理想的書生而言，被迫離開校園可說是相當沉重的打擊，而商場中的爾虞我詐、純粹以「利潤」為驅動力的實況，更是使得懷抱「公平」、「正義」理想的王拓，感到格格不入，無盡挫敗。但是，就筆者的觀察看來，現實生活的磨難卻也提供了一個連結「理論」和「現實世界」的契機，因為被迫脫離校園，王拓得以將過去學習、吸收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擺放進現實世界中做真切的評估考察，因此這「最感挫折、苦悶」的兩年，成為他一生中寫作最勤、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落入現實」的王拓，此刻邁開了建構自身理論主張的步伐。

進入 1977 年，王拓因現實磨難而備受壓抑的寫作欲望爆發開來，從 4 月起每月皆有小說作品發表，並於 9 月集結出版為《望君早歸》一書，正式代表著他

---

是比較屬於改良主義的；那個時候我是比較屬於革命的想法，覺得他們的意見我聽不太進去。所以我在第二期時有寫一篇文章「歷史潮流中的前進與倒退」，用我的觀點去批判一個已經成為歷史人物的改良主義者胡適，事實上也是批評那個階段台灣中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結果那篇文章《台灣政論》沒有登。語見「從文壇走向美麗島：王拓，《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頁 149。

<sup>86</sup> 《夏潮》於 1976 年 2 月創刊，原由蘇慶黎前夫鄭泰安主辦，本欲編成「東方的讀者文摘」，但銷路並不理想。第三期找來蘇慶黎幫忙編輯，1976 年 4 月起由她接辦。



的創作來到了「批判的現實主義」時期；同時，他也在《中國時報》撰寫「人間方塊——關心人間」系列文章、在《夏潮》發表多篇社會報導文字（後多收錄於《民眾的眼睛》），綜觀這些篇章，內容多半關注於底層民眾的困苦生活、揭露政府施政之不當，並提出許多頗為具體的改革辦法，此刻王拓的發言可說具有「無產階級」代言人的立場傾向；此外，王拓在4月所發表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引發了日後一波激烈的「鄉土文學論戰」，並又因與彭歌、孫震之間的文章攻防，意外在以「文學」為名的論戰中牽引出關於「台灣是否為殖民地經濟」的論辯。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不少人認為它其實並非是場「文學」的論爭<sup>87</sup>，不過就論戰起始的三篇文章看來，基本上爭議點還是在於「鄉土文學」的詞義及其發展動向上，各路人馬有著不同的解讀與擔憂，爾後直到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及余光中〈狼來了〉二文發表，對於「文學」的討論才降低了。論戰至此，真正造成激烈擦撞、對決的便是「官方」與「反官方陣營」背後不同的意識型態及世界觀／歷史觀了。當然在七〇年代的時空下是不容許反官方言論明顯化的，因此「官方意識型態背後夾帶的集體暴力威脅，註定了這不是一場公平的理論競爭」，也因此以《夏潮》為核心的「鄉土派」論述，其「左派式的社會圖像不得不自覺或非自覺地躲在一些修辭的策略後方，才不至於立即招來無情的打擊」<sup>88</sup>，於是論戰中出現了許多「孫中山」、「三民主義」、「蔣院長」等等煙霧彈，而且「夏潮」也與國民黨大老胡秋原的《中華雜誌》形構成一個相互掩護的陣線，利用「民族主義」、「民族文學」等詞語來掩蓋偷渡「鄉土文學」背後所挾帶的「階級」論述。

關於「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前人討論的篇章已非常多<sup>89</sup>，筆者在此不擬細

<sup>87</sup> 如楊照，見 惡化的歷史失憶症 「鄉土」重訪，《流離觀點》（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91年11月12日）。

<sup>88</sup> 楊照：惡化的歷史失憶症 「鄉土」重訪，《流離觀點》（台北市：自立晚報出版部，1991年11月12日），頁137-138。

<sup>89</sup> 如陳正醜：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一文，發表於1981年《台灣近代史研究》第3號（日本），是最接近論戰發生時間的文章，另外尚有李祖琛：《七十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析論——傳播結構的觀察》（政大新聞所碩士論文，1986年）藍博堂：《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及其餘波1971-1987》（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2年）翁慧雲：《文學與政治：七〇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究，以下僅就王拓在論戰中的文字做分析探討。

進入七〇年代以後，「回歸鄉土」、「回歸現實」的呼喊造成了鄉土文學的熱潮及文學典律的轉移，因此 1977 年 4 月號的《仙人掌》雜誌製作了討論鄉土文學的專輯，其中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銀正雄〈墳地裏哪來的鐘聲？〉、朱西寧〈回歸何處？如何回歸？〉三篇文章，被視為是 77 年鄉土文學論戰的起點。其中王拓的文章在起頭處便言：「文學的研究應該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與社會的客觀條件上加以考察，才能理出一個清晰的面貌來」，然後他便由 1970~72 年的台灣社會背景及遭逢的外交困境談起，再回顧 1949 年以後台灣文學的發展情形，大致上社會背景、歷史發展的描述佔了文章篇幅的四分之三，很明顯地展現了社會主義者注重歷史脈絡的論述風格。然後王拓提到「許多人在談起『鄉土文學』時，留給我一種印象，就是所謂的『鄉土文學』是以鄉村為背景，以鄉村人物的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並且在語言文字上運用許多方言的作品」，他認為描寫鄉村的文學之所以流行並受人喜愛，在高度經濟發展、農村日漸破敗的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鄉土文學」不應該只是停留在「鄉村文學」或甚至流於「鄉愁文學」，他認為所謂的「鄉土」應該是指「台灣這個廣大的社會環境和這個環境下的人的生活現實；它包括了鄉村，同時又不排斥都市」，因此為了避免引起觀念混淆及感情誤導，王拓認為有必要把「鄉土文學」改稱為「現實主義」的文學。王拓的論調雖然否定「鄉土文學」的名稱，但是他卻是七〇年代以來「鄉土文學」的發展動向，而試圖運用現實主義的概念來重新把握「鄉土文學」。

而銀正雄的文章則站在王拓的對立面，他認為王拓所肯定而要改稱的「現實主義」文學，是民國六十年後逐漸變質的鄉土文學：「我們發現某些『鄉土』小說的精神面貌不再是清新可人，我們看到這些人的臉上赫然有仇恨、憤怒的皺紋，我們也才領悟到當年被人提倡的「鄉土文學」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銀正雄的論調與日後彭歌、余光中攻擊「鄉土文學」有著類似的

---

1994 年) 何永慶：《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研究》(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 年) 王若萍：《一個反支配論述的形成——七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論述與形構》(師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7 年) 等學位論文。

脈絡，也是鄉土文學論戰中「反鄉土派」最大宗、最典型的批評方式：認為文學不該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不該挑起階級對立，甚至認為鄉土文學根本是中共三〇年代農工兵文藝的翻版。

而朱西寧的文章則可視為另一類對於「鄉土文學」的攻擊，他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並且質疑如要「回歸鄉土」，那麼應該要回歸何處的鄉土？台灣「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來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筆者認為朱西寧的論調與戰後初期來台大陸作家所持的「日本殖民餘毒」說並無二致，同樣都是懷抱著中原文化的老大心態，質疑、批判孕育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學。

王拓在前文發表後不久，又於5月10日的《中國論壇》上以「李拙」為筆名發表了〈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一文，內容闡述了日治時代到1970年代台灣文學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及社會背景，並於文末提出他的總結：

一、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才能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而為廣大的民眾所愛好和擁戴。而這種具有明顯、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因為具有較真誠的道德勇氣、較強烈的愛心和熾熱的感情，所以也往往更具有感動人心的說服力。二、文學的發展必須能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文學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sup>90</sup>

這個總結可說是王拓七〇年代「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最具體呈現，強調文學社會性的潮流，並企圖藉由文學「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這樣的文學觀是將文學工具化的論調，文學的目的是為了改良社會，可說是一種「使命文學論」。

<sup>90</sup> 李拙（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原發表於《中國論壇》第4卷第3期（1977年5月10號），後收錄於王拓：《街巷鼓聲》及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而戰火的對立升高，則是在八月份彭歌的〈不談人性，何有文學〉及余光中〈狼來了〉發表於《聯合報》副刊之後。彭歌的文章點名批判王拓、陳映真和尉天驄三人，他認為王拓分析「鄉土文學」的興起背景時，使用「殖民經濟」、「買辦經濟」來形容台灣三十年來有目共睹的經濟建設成績是不正確的，而反抗「帝國主義」首要目標是在「反共」，王拓反對以美、日為主的外資，根本是在「轉移目標」；再者他指責王拓的文學評論不以「善惡是非」為標準，而祇以「收入高低」為標準，這種以「物」不以「人」的評價論調容易陷入「階級對立」、「一分為二」的錯誤，這種偏差如延伸到文學創作上，便會呈現出曖昧、苛刻、暴戾、仇恨的面目。<sup>91</sup>

針對彭歌的批評，王拓在次日即連夜寫了〈擁抱健康的大地〉一文回應。<sup>92</sup>文中他表示自己並未漠視台灣的經濟進步，相反地還對此極為讚揚，但不容諱言的，在經濟高度成長、工商業普遍進步的同時「我們的社會也出現了農人和工人的利益被忽視的偏差現象」，而工商業也有著「過分仰賴外國、且有為數頗大的部分被外國所控制」的缺點，因此他呼籲大家必須愛護腳下所踩的這塊土地，如果「明知道她有缺點、有疾病，卻又忌病諱醫」，反而會「導致她全身的潰爛、腐敗和死亡」。<sup>93</sup>

基本上王拓以社會主義角度切入台灣的經濟發展，所得出的結論及所關懷的階級，勢必與右翼官方立場的彭歌有所不同，而王拓對於批評社會的不合理、揭露黑暗面顯得相當堅持、毫不退讓，他拒絕掩蓋問題和缺點，並認為確實反映社會的缺點，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

而其對於台灣社會與經濟本質的闡述，在 10 月中又引來了時任經建會副主委孫震的批評，在〈台灣是殖民經濟嗎？〉一文中，孫震認為王拓對台灣經濟的描述「本身已經構成一種對社會向心力和團結的破壞」，他承認台灣的工資比起歐美與鄰國相對來得低，但是「工資低是因為我們的平均勞動生產力低」，如果

<sup>91</sup> 見彭歌：〈不談人性 何有文學〉，原發表於《聯合報》副刊（1977年8月17日—19日），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sup>92</sup> 據王拓的說法，此文被聯合報扣押了將近三個禮拜，在9月10日以後才得以發表。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王拓出版、王拓後援會經銷，1989年5月），頁17。

<sup>93</sup> 見王拓：〈擁抱健康的大地——讀彭歌「不談人性 何有文學」的感想〉，原發表於《聯合報》副刊（1977年9月10日—12日），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把貨幣工資的提高超過了勞動生產力的增加，便會引起物價上漲，因此唯有加速經濟發展才是最有效的改善方式。另外孫震也承認台灣的經濟貿易有容易被外國人掌握的弱點，但是他並不承認這是所謂的「附庸經濟」，而認為台灣的工業多是加工出口業，乃經濟發展必然也相當正常的國際分工現象。<sup>94</sup>

對於孫震的論點，王拓又寫了〈「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一文回應。他認為二次戰後的「新帝國主義」，已經不再用軍隊或直接的政治力量控制他國，而多是利用高科技、資金與政策的相互配合，「打著『經濟合作』或『技術合作』的美名，和『跨國公司』的形式，提供資金、設備和技術給所謂『落後國家』，以達到控制落後國家的經濟的目的」，而這便是他所謂的「殖民經濟」。他並認為孫震也承認台灣在經濟上依賴他國，只是不願使用「殖民經濟」一詞，其目的是為了掩飾台灣經濟被操縱的事實。他認為台灣應該要有強烈的「自主意願」，追求經濟上的獨立自主，並提出「日本也是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也需要大量進口，為什麼它的經濟不但能不被人控制，反而還可以控制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呢？」的有力證據。此外，王拓也回應孫震的觀點，認為近年來台灣的工資確實有提高，工人生活確實有改善，但是如果拿來和資本家的利潤和生活水平相比，可是「人比人會氣死人的！」，他認為此改善並未達合理的地步，工人依然無法分配到他們應得的「份額」，而且他也強調孫震「提高工資會導致物價上漲、引起失業」的論調，很容易成為資本家繼續以低工資壓榨勞工有利的藉口。<sup>95</sup>

關於這些「文學」論戰意外牽扯出的「經濟」論辯文字，陳正醜曾明確地歸納出爭論的問題點：一是如何調整經濟發展與經濟平等的問題；二是如何調整因為經濟發展而生的對外資的依賴與為了經濟自主的反帝國主義之間的問題。<sup>96</sup>而我們如從雙方的思考角度來切入，則可以發現王拓所立足的意識型態基礎，與孫震及彭歌皆是非常不同的，基本上官方立場所著眼的在於總體經濟的發展，而王

<sup>94</sup> 見孫伯東：「台灣是殖民經濟嗎？」王拓先生「擁抱健康的大地」讀後，原發表於《中國論壇》5卷2期，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sup>95</sup> 見王拓：「殖民地意願」還是「自主意願」？孫伯東「台灣是殖民經濟嗎？」讀後，原發表於《中華雜誌》173期（1977年12月），後收錄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

<sup>96</sup> 見陳正醜：「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清理與批判——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曾健民編，台北市：人間出版社，1998年冬），頁159。

拓注重的則是經濟發展底下所謂「分配正義」的問題，這個「分配正義」不僅可以擺放到國內資本家與中下階層經濟不平等的角度來觀察，也可以擺放到國與國之間「貿易依賴」的角度來考察，進而推展出一系列「階級平等」、「反帝國主義」等左翼的關懷呼求。

此外，陳正醜也提到關於上述「唯現代化」論和如何確立「統馭現代化」原則，及其與民族主義思想之間關聯性的議題，在「鄉土文學論戰」之後 1978 年夏天的「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中，依然是一直被反覆討論的。<sup>97</sup>但就筆者的資料觀察看來，到了 1978 年的《夏潮》因為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逐漸有「政治化」的傾向，同時也因為與「黨外」逐漸結盟，而使得其與國民黨大老胡秋原的《中華雜誌》產生微妙的矛盾情結，因此在「現代化與民族主義」論戰中，《夏潮》大概只有南方朔的間接參與以及王曉波在《中華雜誌》上的文章而已。當然，1978 年已決心投入年底選戰的王拓，自然更不可能加入戰局了。

## 五、《夏潮》 《春風》 《美麗島》：躍身政治的王拓

其實在 1977 年以前，康寧祥曾經相當鼓勵王拓從政，參與選舉<sup>98</sup>，但由於當時的王拓並不支持政治上的「改良主義」，因此加以婉拒。而 1977 年的選舉，反對勢力大舉當選，再加上「中壢事件」的激情，使得在野政治勢力正式串聯出「黨外」的民主運動力量。而原本懷抱著「革命」思維的王拓，首先看到了文革殘酷批鬥第一代的革命家，便對於「革命」路線有所檢討，然後在經歷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官方集團式批判撻伐後，更認為當時的台灣並未構成「革命」的條件，因此在蘇慶黎的建議之下決定投身選舉，而《夏潮》也逐漸政治化。

在《夏潮》當中，蘇慶黎的思想觀念一直是與王拓比較接近的，對於參與政治選舉，她也有著與王拓在「鄉土文學論戰」後類似的體悟：

在國民黨那種高壓統治底下，你一定要先打開那種政治跟言論空間，否則所有階級問題是不可能談的，做運動都不可能 台灣民主的發展如果不

<sup>97</sup> 同上註，頁 160。

<sup>98</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19。

是透過不斷的民主運動，打開這個空間，後來的工會運動是不可能的，你只樣稍微寫一下工人的問題，你可能就要去坐牢。<sup>99</sup>

因此，決心投入政治選舉的《夏潮》以王拓為核心，從 1978 年 3 月開始展開一系列對政治人物的報導訪談。從選舉的策略性考量來看，如此的訪談報導工作對「黨外」及《夏潮》而言，實有互利相輔的效果：首先，訪談可以加深原有路線差異的兩陣營彼此的互動認識，並展現出團結聯合的氣勢；再者，訪談報導文章的刊登，對於訪談人王拓及受訪的政治人物而言，無疑都是相當好的宣傳；而這些篇章在 9 月集結出版為《黨外的聲音》一書，更是選舉造勢場合中的募款文宣品，王拓自己在基隆挨家挨戶拜訪里長時，也是帶著《民眾的眼睛》及《黨外的聲音》發送，並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sup>100</sup>

雖然此時的《夏潮》有逐漸與「黨外」結合的趨勢，但是其在有意或無意間依然保留著某部分和「黨外」異質的思想路線。例如有別於「黨外」特尊黃信介及康寧祥，在《黨外的聲音》的訪談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夏潮》比較重視黃順興及余登發，究其原因，乃是黃、余兩人重視「階級」及「反分離主義」的言說，與《夏潮》的意識型態較為接近之故。<sup>101</sup>

1977 年黨外陣營經過集結及組織動員，聲勢十分浩大，也預估年底的選舉將獲得空前勝利，但 12 月 16 日美國與中共宣布建交，蔣經國藉機發佈緊急處分命令，終止一切選舉活動，黨外在當日中午曾要求盡速恢復選舉，但是並沒有下文。1978 年底選舉被迫停止後，「全省黨外助選團」改稱「黨外候選人聯誼會」，企圖延續這一年來愈見成熟的運作模式及氣勢。

因為黨外聯合陣營的迅速茁壯，導致國民黨在接下來的 1979 年展現出強硬的統治者態度，在 1979 年 1 月爆發的「吳泰安匪諜案」中，余登發被以「涉嫌參與」的罪名逮捕，進而導致黨外人士（包括王拓）在高雄橋頭的示威遊行。而

<sup>99</sup> 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 年 1 月）的「訪蘇慶黎」部份，頁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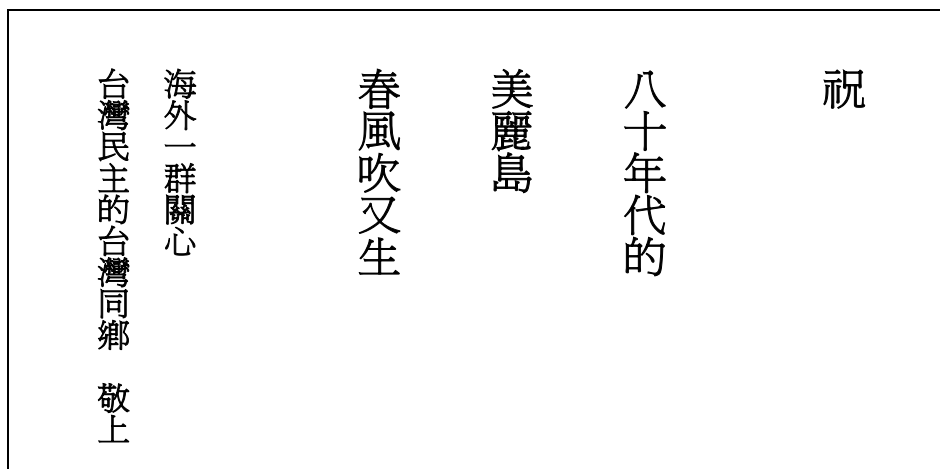
<sup>100</sup> 見 未竟的選戰 3：王拓、楊青矗投筆參選，《沒有黨名的黨——美麗島政團的發展》（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 年 11 月 29 日），頁 90。

<sup>101</sup> 見王拓：《黨外的聲音》（王拓發行、長橋總經銷，1978 年 9 月 15 日）。

在余案之後，國民黨政府將《這一代》及《夏潮》停刊，並且也以許信良參與遊行並未向縣政府請假的理由，判以停止桃園縣長職務兩年的處分，白色恐怖的陰影再度籠罩反對陣營；9月，《美麗島》於中泰賓館的成立茶會上，發生了《疾風》人士的抗議衝突事件，此後陸陸續續大小衝突不斷；12月10日，《美麗島》於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演講活動，最後爆發了「美麗島高雄事件」，黨外人士於事件後被大逮捕，王拓也因此身陷囹圄。

在《這一代》及《夏潮》被停刊後，以雜誌作為選舉活動根據地的黨外陣營，亟思再行創辦刊物來打破空窗期。在1979年的6月康寧祥創辦了《八十年代》，而象徵黨外大聯合的《美麗島》雜誌於八月創刊，《夏潮》為了有別於「黨外」並延續思想路線，陳鼓應的《鼓聲》於9月出刊，不過《鼓聲》僅一期即被查禁，而王拓的《春風》則接續其後在11月登場。

就多方面來觀察，「夏潮」系統到了1979年後，其實依然與「黨外」保持著既聯合但又有所差異的微妙關係。在「聯合」方面，王拓、蘇慶黎、陳鼓應等人均為《美麗島》的社務委員，而黃信介、康寧祥、許信良等亦列名《春風》的社務委員，編輯人馬的互涉可知雙方的「聯合」態勢，而《春風》也藉由各地的「美麗島服務處」做經銷的工作。另外，筆者也在《春風》雜誌上發現到由「八十年代」、「美麗島」、「春風」等詞彙聯結起來的祝賀圖樣，更可證明在外界眼中亦認為此時的反對陣營有著所謂的「聯合陣線」：



《春風》第1卷第2期(1979年12月),頁8。



不過在思想路線上，「夏潮」系統刻意與「黨外」保有區隔。郭紀舟認為：

鄉土文學論戰後夏潮系統開始推動文化造型運動、民歌運動、參與政治選舉以及走向工農漁礦社會階級調查的《春風》雜誌。夏潮系統似乎走出文學論戰的陰影，反而開大門更明目張膽的進行左翼實踐行動。<sup>102</sup>

透過與胡秋原《中華雜誌》的結盟，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夏潮」人士並未被官方「處置」，最後達成了表面上的「民族主義」、「民族文學」結論共識。在此基礎之上，日後《夏潮》的民族及階級論述便具備了一定程度的正當性／被包容性，爾後「一九七八年春《夏潮》儼然成爲階級矛盾的代言人，並進行談論農工社會問題的擴大結盟」。<sup>103</sup>

而到了《春風》雜誌時，王拓也表示：

尾啊停止選舉，接下去黃信介他們就去成立一個《美麗島》雜誌嘛，啊我就去成立一個《春風》啦，啊康寧祥就去成立一個《八十年代》，有很多項雜誌就是啦。那我自己是跨兩個雜誌，就是說我一方面是《美麗島》那邊的編委跟社務委員，然後我自己又弄了一個《春風》。這個《春風》雜誌呢，是反映了一些比較屬於中下階層的實際生活狀況的報導的東西啦，那《美麗島》是比較高調的，都在談政治啦、憲法啦、政治改革啦、選舉啦 等等，所以如要嚴格分起來就是說，一種是屬於卡左派的方向，一種是屬於卡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派的那種方式。<sup>104</sup>

有別於「黨外」的中產階級傾向，《春風》的內容多在關懷農、漁、工、礦等底層民衆的困苦生活，可說是「七〇年代最『左』的刊物」。王拓個人也在雜誌上發表〈發展漁業，確保漁民生活〉及〈在黑暗中討生活〉等爲漁民、礦工發聲的

<sup>102</sup> 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207。

<sup>103</sup> 同上註，頁225。

<sup>104</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23-24。

文章。

除了與「黨外」有所不同，其實《春風》雜誌也與《夏潮》及陳鼓應的《鼓聲》有所差異。《夏潮》的文化性格十分強烈，原先並不定位自身為政論刊物；而《鼓聲》則「等於是對《夏潮》雜誌三年來在立場上的總結，包含了『統一』與『左翼』的共同一致性」；但是《春風》卻是「繼承了《夏潮》比較具有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那一部分是不在裡頭的。」<sup>105</sup>

從對於「勞動基準法草案」及「工會問題」的大篇幅報導亦可觀察出《春風》有別於《夏潮》的歷史文化傾向，重視透過政治選舉運作來改善「階級」問題；另外，透過進入「階級矛盾」的訴求，也有利《春風》跟《美麗島》做出支持群眾／選票的有效區隔。短短兩期（「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被禁）的《春風》可說是七〇年代將「階級」與「選舉」結合在一起的最具代表性刊物，由此我們可觀察出王拓由「革命家」轉為「參選人」的思想變化軌跡。

---

<sup>105</sup> 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頁360—331。

#### 第四節 小結：一個「文學功利主義者」的去路

經由前幾章節的考察，我們對於王拓七〇年代的創作歷程與行動實踐（及其背後的思想脈絡）已經有較具體的把握。而在此結論處，筆者擬對於王拓「從文學到政治」的行動做出詮釋，並闡述《夏潮》內部對此動向的異質思考。

##### 一、躍身政治：「隱含讀者」的失落

筆的力量如果只能跳動在白紙黑字間，效果終究是很有限的。在我從事的七八年中，我逐漸體認到，如果不能把筆的力量從白紙黑字間伸展出來，和廣大的民眾融和在一起，那麼，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所秉持的良心和正義，畢竟是孤獨而脆弱的。基於這樣的認識和瞭解，我開始對自己做為一個寫作者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待。

王拓<sup>106</sup>

王拓七〇年代的創作軌跡乃呈現著「前·現實主義→描寫的現實主義→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演變圖式，其所代表的便是王拓個人內在精神與創作實踐上，逐步激化、升高的現實主義觀及批判火力。進入七〇年代後期，王拓的文學觀念在曾是論戰文字的〈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當中，有著最具體的呈現：

概括地總結二十世紀以來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發展，我們可以得到幾個結論：一、文學必須紮根於廣大的社會現實與人民的生活中，正確地反映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民眾心中的悲喜，才能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而為廣大的民眾所愛好和擁戴。而這種具有明顯、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的文學，因為具有較真誠的道德勇氣、較強烈的愛心和熾熱的感情，所以也往往更具有感動人心的說服力。二、文學的發展必須能與當時的社會發展相一致；文學運動必須能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或與社會運動相結合

<sup>106</sup> 見王拓：《王拓：從文學到政治》（基隆市：王拓後援會，1989年5月），頁20。

，文學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它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sup>107</sup>

由「社會真摯的代言人」、「發展為一種社會運動」、「改良社會的熱情和功能」等字眼可以觀察到，此時王拓的「現實主義文學論」是將文學工具化的論調，文學的目的乃是為了「改革社會」。王拓自己在訪談中也不諱言地認為「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時代呢，我是一個文學的功利主義者……我是希望透過文學來改革社會，所以就會比較傾向於寫實主義」。<sup>108</sup>但在這裡我們要問的是，既然期許自己成為「時代和社會真摯的代言人」，並且希望透過文學來改良社會，為何日後的王拓又要投文學之筆而躍身政治？

當然，對於王拓及楊青矗從文學走向政治，最後甚至因「美麗島事件」而身陷囹圄的過程，不少論者提出過詮釋與評價，如葉石濤便認為：

從鄉土文學論爭開始以來，台灣作家始終提倡「參與的文學」(Committed Literature)，以為文學創作活動是一種實踐活動，欲以文學作品的內涵來感化民眾。然而，正如所有屬於第三世界的作家一樣，他們面對的是現代工商消費社會的麻木不仁和腐敗，文學作品的銷路和影響有限。人道主義的關懷，正義感的伸展等美夢也就都成為泡影了。王拓和楊青矗之所以直接參加政治活動，乃是自然發展的結果。<sup>109</sup>

而王拓自己則表示：

我會從文學創作走向政治，也是因為對社會的熱情越來越大、對社會的問題越了解，就越覺得文學很無力。大家都稱讚《金水孀》寫得很好，但是看的人有多少？一年出兩版，兩版就只四千本；但康寧祥在台北橋頭演講。夭壽！一場就有兩萬人！颱風天，還沒有人走掉！這對我是個很大

<sup>107</sup> 李拙（王拓）：廿世紀台灣文學發展的動向，原發表於《中國論壇》第4卷第3期（1977年5月10號），後收錄於王拓：《街巷鼓聲》及尉天驄：《鄉土文學討論集》。

<sup>108</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8。

<sup>109</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87年2月），頁168。

的誘惑。我覺得若是透過嘴巴來宣揚理念，一下子就可以讓很多人來聽。既然台灣沒有革命的條件，那我就來參選，我相信透過這種演講傳布效果，比文學更快。<sup>110</sup>

就以上葉石濤及王拓自身的解釋看來，當一個作家介入現實、改革社會的高度熱情，並不是文學創作與銷售速度所能承擔時，其尋找更直接有效的管道便是有跡可循的了。但筆者認為如此解釋依然不夠具有說服力，因為當一個文學作家懷抱有「透過文學來改良社會」的熱情時，難道未曾設想過文學的銷售速度及傳佈效果的侷限性嗎？此外，換個角度思考，即使銷量、速度及傳佈效果皆有限，但是書籍是可以流通、多人轉手、反覆閱讀的，其影響範圍未必比短暫性的激情政治演講會要差上許多，更不是「一年四千人」與「一次四萬人」如此的懸殊差距。筆者認為其中未思索到的關鍵，乃在於作家在寫作中預設所欲喚起的「隱含讀者」與現實生活裡的民眾是存有落差的，基本上王拓所構想的「隱含讀者」在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是少有存在的。

美國學家查特曼（S·Chatman）根據布斯（W·C·Booth）《小說修辭學》當中關於「隱含作者」及「隱含讀者」的概念，為敘述文本的交流過程規劃了下列的圖式：

#### 敘述文本

真實作者      隱含作者（敘述者）      （受述者）      隱含讀者      真實讀者<sup>111</sup>

當然，無論是查特曼的圖式或是布斯的《小說修辭學》裡頭，所強調的都是由作者朝向讀者這樣的單向流動模式，與「讀者反應理論」興起後強調的雙向交流過程有著一段落差，但是這樣的單向模式卻無損於我們思考，當時身為一個「文學

<sup>110</sup> 見 從文壇走向美麗島：王拓，《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11月29日），頁150。

<sup>111</sup> 轉引自譚君強：《敘事理論與審美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9月），頁24。

功利主義者」的作家王拓，他是如何在作品中呈現他的觀念與批判，又是如何地預設他的讀者群可能被喚起。當然，最終得到的結果也許是失落的。

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提出了有別於真實作者的「隱含作者」概念：

在他（作者）寫作時，他不是創造一個理想的、非個性的「一般人」，而是一個「他自己」的隱含的替身，他的不同作品都將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規範組成的理想 作家根據具體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態度表明自己。<sup>112</sup>

「隱含作者」並不是敘事文本中可見的具體事物，但在布斯的觀念中每個敘事文本都隱含著作者的「第二自我」，「隱含作者」（第二自我）在智力和道德標準上常常高於真實作者本人，可說是真實作者本身高度理想與道德情感的投射。王拓在他的每篇小說中，隨著主題內容的不同當然也以「不同的態度表明自己」，但總括來說，其小說所隱含的「第二自我」無非是「關心底層民眾」、「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懷抱高度的改革社會熱情」……等等形象的。而在訪談中論及因「美麗島事件」而坐牢的心情時，王拓也顯示了「真實作者」與「隱含作者」之間的區別：

我自己去坐牢以後才發現，我沒有那麼偉大啦！我的心還是肉做的。我上次跟你們講過，我一直以來都是認為我是一個革命家，革命家要什麼？要為了革命的理想可以死啊，可以犧牲啊 然後去坐了牢以後我發現說，人無這呢【這麼】勇敢啦，人的心肉做的嘛，你想到老母、想到某子，你也是會艱苦呀。<sup>113</sup>

此外，在布斯的《小說修辭學》當中，與「隱含作者」相對舉的概念即是他對於

<sup>112</sup> 布斯 (W.C.Booth) 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 80-81。

<sup>113</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33。

讀者角色的思考：

如果我要欣賞他的作品，我就必須大體上同意它的隱含作者對所有事物所持的論點。當然，也必須對作為讀者的我與正在付賬單、修漏水龍頭、缺乏仁慈與明智的那個時常很不相同的我之間加以區別。只有在我閱讀時，我才變成了必須與作者的信念相一致的那個自我。簡言之，作者創造了一個他自己的形象和另一個他的讀者的形象；正如他創造了他的第二自我，他也創造了他的讀者，最成功的閱讀是這樣的：在閱讀時被創造出來的兩個自我，作者和讀者，能夠找到完全的和諧一致。<sup>114</sup>

筆者認為如王拓這樣的一個「文學功利主義者」，在七〇年代企圖「透過文學來改良社會」，基本上乃是預設了有一讀者群在閱讀其文學作品時，能夠與其「隱含作者」的高度熱情、理想達到完全的和諧一致，讀者能夠被作者喚起共同來改善社會的不公不義，但事實上這是一個必然面臨失落的假設，因為許多的研究都顯示，戰後台灣的農民與工人階級意識相當薄弱，無法由消極的「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 轉變為積極主動的「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sup>115</sup>，王拓筆下所刻劃窮苦漁村的漁民、商業社會中被剝削的底層勞工，對他們而言可能「付賬單、修漏水龍頭」才是最真實的生活面。在〈望君早歸〉裡，邱永富一直不斷在背後替船員家屬打氣，希望他們能夠拒絕不合理的賠償堅持下去，但是在船公司利誘及各個擊破之下，家屬們後來都領錢蓋了章，使得邱永富的努力幾乎付諸流水；在王拓八〇年代的長篇作品《牛肚港的故事》中，也描述了主角在大學時代參與「百萬小時奉獻運動」，到台灣鄉間各角落去調查人民生活現況時的情形：

他們原以為，漁民和礦工一定會對他們的熱心奉獻和服務給予熱烈的回應。想不到，結果卻大大出乎了他們的意料。鄉下人竟將他們的訪問，當成

<sup>114</sup> 布斯 (W.C.Booth) 著，華明、胡曉蘇、周實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152。

<sup>115</sup> 見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台北市：巨流出版公司，2003年9月)第7章 社會階層化，頁181。

是大學生來鄉下度假看風景而已。對於他們的設計的各種問卷，甚至連起碼的關心都很少。這些漁民的反應給了他們一次很大的教訓。他們原先都把民眾——尤其是他們心目中所謂的貧苦大眾——的政治熱情和政治意識估計得太高了，民眾實在還需要大大地再教育。<sup>116</sup>

底層民眾所碰觸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壓力，與知識份子腦袋中所構思「社會改革」的理想存在著不少落差。再者，「畢竟『鄉土文學』的讀者，主要為學生和中產階級，因此，其啓蒙效果充其量也只限於某些階層」<sup>117</sup>，「文學功利主義者」所構想同時具有社會改革需求及實踐行動力的「隱含讀者」群，實際上在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中可說是不存在的。因此其理想的失落，除了文學的傳播量及傳播速度可能不甚理想之外，無法喚起底層民眾才是真正的關鍵所在。關於此點，與王拓在七〇年代同為《夏潮》撰稿者，後來也加入民進黨的林俊義的發言，雖有著知識份子的本位思考，某程度上卻也明白點出台灣社會的真實面：

我越參與越覺得台灣的政治發展面向，某種程度沒辦法喚醒群眾，因為我看到太多的群眾，他們在你面前說支持你，背後卻在說風涼話，我看得太多了，把這些人喚醒簡直比把死人喚醒還難，你不能等他們，你要帶他們，這就有一點資本主義的作法了，這跟左派思想不同，老毛子說要把群眾喚醒才能成事，我覺得台灣人等著你呼喚，所以在台灣政黨政治的效果最大、最快。<sup>118</sup>

因為「隱含讀者」的失落，王拓身為一個「文學功利主義者」，企圖以文學改革社會的理想也終將面臨失落。因此七〇年代後期他會擲文學之筆躍身政治，或許也是認知到透過政治，社會改革的理想與熱情是比較容易實踐的。再者，透過政

<sup>116</sup> 見王拓：《牛肚港的故事》（台北市：草根出版，1998年5月），頁134—135。

<sup>117</sup> 江迅語，見《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一個文化霸權的崛起與崩解》，發表於《南方》第9期（1987年7月），頁37。

<sup>118</sup> 見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83學年度碩士論文，指導教授：鄭梓）的「訪林俊義」部分，頁82。



治的傳播管道，其所能夠喚起的民眾或許與文學作品的讀者也是有所不同的。

## 二、革命家 參選人：文化 政治實踐路線的異質思考

王拓當然「左」呀！但是「左」對民主陣營有什麼不好？而且，選舉可以讓人家改變呀，選舉到後來就是為了勝選，選舉會改變一個人。

許信良<sup>119</sup>

在談論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及「黨外」陣營對於黨國政權的批判時，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總是被不少人援用<sup>120</sup>，這是由於當時台灣的社會環境與理論基礎有相似之處。基本上我們可以將國民黨及其親近人士視為一統治階級，透過戒嚴令、報禁、黨禁等相關規定營造出其「文化霸權」的運作空間，然後透過大中國「正統」史觀的教育與各式政令宣導向台灣民眾進行意識型態灌輸的工作，形塑黨國威權神話，以法統、道統來確認維繫其在台灣統治的合法性。而七〇年代「黨外」陣營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批判，及「鄉土文學論戰」中對於文學典律的競逐，種種鬆動黨國威權、攻擊制度面及政權合法性的動作，可視為是對統治階級所進行的「陣地戰」——在市民社會中所進行的「文化霸權」競逐。但筆者在此想提出的是，這些援用「文化霸權」概念的篇章，除了江迅以外似乎都較少提及葛蘭西的理論中，「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 此角色的重要性：這些「有機知識份子」有別於「傳統知識份子」的跨階級性格，他們不自外於生產關係，而與社會的某一階級結合成一整體。在台灣的七〇年代，確實有一批聰慧早熟的非國民黨知識菁英出現，勇於挑戰統治政權，但他們是否與底層民眾形成了「聯合有機戰線」？而不少人在七〇年代後期投身於政治選舉活動，如

<sup>119</sup> 見附錄二：《訪談王拓》，頁 26。

<sup>120</sup> 如郭紀舟：《一九七〇年代左翼啟蒙運動——〈夏潮〉雜誌研究》（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83 學年度碩士論文）；江詩菁：《宰制與反抗：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之文化爭奪（1975—1989）》（台南師院台灣文化研究所 92 學年度碩士論文）；辛築：《論戰的舞台：一隻看不見的手——台灣傳播結構的省察》，《南方》第 9 期（1987 年 7 月），頁 19—24；江迅：《鄉土文學論戰：一場迂迴的革命？——一個文化霸權的崛起與崩解》，《南方》第 9 期（1987 年 7 月），頁 29—37。

此的行動使得「聯合有機戰線」到底是擴大了與底層民眾的連結，還是由於介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遊戲規則當中，而使得其自身逐漸滅亡消失了？

在1949年以前的台灣，並不缺乏社會主義運動，但是在國民黨政權撤退來台後，即徹底地清除了一切社會主義的根苗，就世界各國戰後多半還保有一定程度的「左翼傳統」來看，台灣如此「斷裂」的情形可說是相當少見。而這樣的斷裂一直到了七〇年代，由於社會經濟發展到達了一定水平，並有「回歸現實」的社會潮流及海外左翼理論的引進，所以社會主義運動似乎又再度出現運作的可能性。而七〇年代的王拓曾經認為自己是個革命家，瞧不起從事選舉的人<sup>121</sup>，他透過文學創作及評論文章，揭露漁村漁民的困苦生活、資本主義社會下底層勞工被剝削的慘況，並且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構築其「現實主義文學觀」，企圖喚起民眾改革社會，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肩負起「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職能。但由於上述「隱含讀者」的失落，及有感於文學不若政治改革來得快而且有效，因此王拓在1978年底的增額立委與國代選舉中，投入了基隆國代的競選，從文學創作走入政治。

這樣的動作在當時的「夏潮」集團中，實際上是存在著不同思考的，畢竟進入議會選舉，亦即進入資產階級式的民主鬥爭遊戲當中，因此如陳映真、蔣勳、王曉波就傾向應該保持文化實踐的路線<sup>122</sup>，而王拓、蘇慶黎、陳鼓應則認為投身政治實踐也未嘗不可。<sup>123</sup>

就七〇年代後期的台灣現實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文化實踐」與「投身政治」兩條路線實各有其優劣：「投身政治」固然能獲得「黨外」陣營的大力支援，但

---

<sup>121</sup> 見 從文壇走向美麗島：王拓，《走向美麗島——戰後反對意識的萌芽》（新台灣研究文教基金會 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編輯小組總策劃。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頁149。

<sup>122</sup> 陳映真：「一直到今天，我覺得左翼運動不能只是看到沒有選上立法委員就沒有效。我是一直覺得左派應該要從群眾或者從階級裡面去開展，開展到一定程度，他也無不必然一定要選，你有一定的強固、廣泛的群眾支持的話，你可以用這些群眾跟比較進步的政治家交換，那麼組織還是要保有一定的戰鬥力」，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的「訪陳映真」部份，頁465。

<sup>123</sup> 蘇慶黎：「我覺得當時介入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是必要的，當時不可能組織工會，唯一能和人民取得聯繫的是透過『選舉』，那我覺得王拓跟陳鼓應是比較接近我這樣的思考。」見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年1月）的「訪蘇慶黎」部份，頁504。

同時也必須承擔國家機器立即出手鎮壓的高風險（「美麗島事件」便是非常好的例子）；再者「選舉會改變一個人」，尤其知識份子往往具有「為民眾代言」的精英本位思考，王拓在短短十年間從文學躍身政治的軌跡，似乎正代表著知識份子們由原先期盼透過構築「聯合有機戰線」來喚醒民眾，到後來認為不如自身投入選舉，與統治階級做政治上的鬥爭，還來得比較有效率些。因此，「投身政治」容易使得自七〇年代初以來，曾經有希望出現（知識份子與民眾連結）的「聯合有機戰線」，逐步地滅亡、消失。

然而，保持「文化實踐」路線是否便能夠維繫、強化「聯合有機戰線」，甚至進行革命奪權行動呢？事實似乎又不盡然。因為在台灣戰後缺乏「左翼傳統」的現實基礎上，「文化實踐」路線喚起民眾的效果終將面臨瓶頸，而且保持文化路線將更使得「夏潮」的組織結構持續「鬆散」，比起自七〇年代中期以來便有「政團」運作模式的「黨外」陣營，其競爭力便相對減弱許多。進入八〇年代以後，強大的商業資本主義無孔不入滲透於日常生活中，與「夏潮」的社會主義主張有所扞格，而逐漸升高的「本土意識」、「台灣意識」又與其強調的「民族統一」論調相互競爭，更使得「夏潮」在八〇年代論述市場的佔有版圖逐漸縮減、式微……當然，這已是後話了，在下一章中筆者將再行探討。

總之，七〇年代的「夏潮」並不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政治組織，而僅是知識份子的同人刊物、團體，因此即使內部有著文化／政治實踐路線上的異質思考，但在彼此的行動上並不相互羈絆，於是陳映真、蔣勳、王曉波等人便持續「文化實踐」之路線，而王拓、蘇慶黎、陳鼓應等人則投身政治選舉。就王拓個人而言，1979年12月的「美麗島事件」及其後被捕入獄，似乎使他與「夏潮」的部份朋友們在兩條路線上的爭執暫時擱置，直到八〇年代後期兩者之間的矛盾才又重新浮出檯面。

